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年11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汪 伟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10月21日和22日，季风书园徐家汇店和陕西南路店各有一次讲座，讲者分别是独立阅读的撰稿人苏小和与刘柠。他们与听众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史和东洋出版业的观察与思考。和电子杂志一样，讲座活动以交流为目的，倡导独立思考，旨在养成公民社会必不可缺的一点常识。讲座内容整理好之后会陆续刊出，与大家分享。

本期独立阅读连锅端出三篇同题书评，作者对《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各有己见，论说的角度和结论都不相同，请读者诸君关注。

我们心目中的公民社会应该有的常识之一，是宽待争论，容忍分歧。多尝试理解别人的立场和角度，不仅可以开阔眼界，也让我们有机会自我审视。和向来的偏见相反，争论不会分裂社会，反而有助于凝聚共识。

对待一本书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一切公共话题，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态度。

勘误

■ 观察员苏小和在10月号的报告中提到，毛寿龙曾翻译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一书。此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之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丈夫，亦为著名政治学家，他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感谢读者指正。

■ 10月号第49页倒数第九行“范建川”应为“樊建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创始人），感谢读者彭磊指正。

目录

来信与勘误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书评·焦点

沈宇哲：一本对台湾缺乏热情的书

贾葭：你们知道浊水溪的长度吗？

王晓渔：你的美丽，我的忧愁

书评

成庆：如何认真面对“政治”

朱白：可以向神要一个苦难的原因吗？

刘柠：中日东亚共同体的前世今生

马慧元：用一生来读历史

孙晓骥：约翰·伯格：有故事的人

羽良：革命、精英与社会思想

行迹

罗四鸽：夹边沟

译介

洋人新左派（二）

伊斯兰的达尔文问题

演讲

苏小和：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独立阅读》成立的时候, 兄弟们曾经定下一个规矩, 主要就新出版的好书说话。这么做的好处, 当然是贴近当下, 同时也贴近国内的出版动态, 但不好的地方也越来越明显。由于国内当下的出版总是乏善可陈, 好书寥寥无几, 多半都是迎合读者的口水快餐, 少数有点学术价值的书, 也经不住细究。况且, 由于人们都在梦里黄金, 得过且过, 因此见之于出版的书根本无法解读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 我的阅读基本上半是已经确定的旧书, 一半才是花花绿绿的新书。而且总体来看, 我想阅读的旧书可谓汗牛充栋, 一本接着一本, 让我无暇多虑; 但对纷至沓来的新书, 我却像一个刻薄的妇人, 横挑鼻子竖挑眼, 总觉得都是垃圾。



旧书的魅力由此凸显。对于当下繁复的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向来坚定地认为, 那不是一些真正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新问题, 早就有各式各样的旧书给我们准备了答案。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中国人现在所走的路, 很多年之前早就有人走过了, 而且还留下了一批大好文献。只是我们面对常识, 总是以特色之名虚以委蛇, 面对陈旧的错误, 却依依不舍。此情此景, 导致中国人一直在某种低级的错误中原地打转, 当然也导致我们的阅读视野持续一百年不动摇的狭窄。

比如关于最近热炒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 我看见各路学者吵成了一锅粥。事情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国进民退”真的是突然冒出来的现象吗? 或者说, 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真的一直在国退民进吗?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 10月26日在上海说: “中央没有‘国进民退’的政策”。窃以为这句话含金量甚高。黄先生的言下之意, 第一乃是肯定现在的“国进民退”已然是一种发展态势, 第二则是告诉我们, 这种态势虽然并不是中央政府有意为之, 但很有可能是30年来“国家能力建设”和“重商主义”交替作用的意外结果。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 我相信3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都是政府有意识地退出部分市场领域, 让民间力量切入, 引入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 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竞争, 才促成了30年的发展。这应该是各个阶层能够接受的共识。否则, 30年前所谓解放思想也好, 改革开放也好, 就没有具体的历史意义了。换句话说, 过去30年, 有条件的国退民进, 才是发展的主旋律。而现在, 如果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成为了当下发展的方法论, 甚至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那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已经到了一个反向操作的时候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层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口号言之凿凿, 岂有走回头路的道路。所以, 沿着黄先生的话说开去, 我的问题只能是: 既然中央政府并没有倡导“国进民退”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实际的经济演进竟然背离中央政策而去呢?

我想说的一句话是, 也许是政府好心办了错事。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 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医治萧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 一旦中国政府执意要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应对萧条, 那些发放出来的巨量货币, 并不会像洪水一样均匀地流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 恰恰相反, 这些信贷货币具有醒目的黏附效应, 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赖的、具有垄断地位的, 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 或者我们干脆就直接说, 这些巨量的信贷资金必然只能流向国有企业, 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 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 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国有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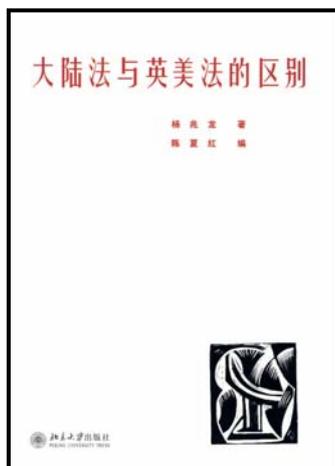
一个饶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当国有企业们一夜之间拥有大量的信贷资金，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财大气粗，但同时也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能够将这些钱用在哪里！人类的条件反射开始起作用，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当然成为国有企业的猎物，而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并购国内私人企业，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的企业经营方法。

这正是今天“国进民退”的景象！不过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金融危机。事实上金融危机只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引子。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的路径在发展，所谓的“国退民进”就是一个局部想象，所谓的“国进民退”才是必然轨迹。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开始再次阅读王绍光的著作《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十几年之后，他所倡导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终于以一种国进民退的方式登场。今天的中国，财大气粗的政府真的可以“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真的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形成了正比。无论是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都看上去理所当然了。但可惜的是，这种不断强调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方式，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企业市场竞争观念背道而驰。当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国家能力”被彰显到一个极高位置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我的意思是说，30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所占规模却是落后于国有经济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些年我们是看到民营企业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热的，是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是几乎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全部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重商主义经济学。

国内有一本这方面的书，就叫《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瑞典人马格努松的著作，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在今天的中国比比皆是。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

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在这样的经济学意义上，我固执的认为，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国退民进”可能就是一种优美的想象，事实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经济领域，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史。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继续纠缠“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就多多少少有点缺乏基本的实证勇气了。

如果说以上是我用旧书在说新事，接下来我再来点用新书说旧事吧。

我要提到的第一本新书，是陈夏红博士编选的《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杨兆龙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相信大陆的读书人，对杨兆龙先生不是陌生。这位民国时代的法学泰斗曾经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全世界50位杰出的法学家之一，但在1949年之后，先生彻底被剥夺了登台授课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其有限的文字被拿来作为他的右派的罪证，并在1979年仓惶离开人世。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杨兆龙先生写于1949年的文章，也可能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最后一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章。陈夏红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参考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各自含义，形成过程、主要区别等问题做出的清晰阐述。但凡涉足法学者，总要首先知晓大陆法和英美法之分别，由此，对问题的各种解释在各种教材以及各种期刊甚嚣尘上，但没有那一篇必得上杨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等缺乏法学训练的人们而言，通读这本书，可能情感方面的唏嘘还是要大过法学上的理性思考。某种意义上，有杨兆龙的大好文章在，民国时代的法学建设就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而1949年之后，杨先生的没落，事实上就是中国法学建设的彻底沦丧，整个国家彻底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这其中，多少粗鄙和无耻沉渣泛起，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法律体系仍然捉襟见肘，法律一直不能成为个人权利的避难所，反而是某些既得利益阶层为所欲为的工具。

沿着法学的路径来阅读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比其他的路径更具有说服力。这是我最近主要的感悟。美国妇人 Dorothy j. sollinger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苏黛瑞 著作, 王春光、单丽卿翻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 在我看来, 就是一本从法学的路径来阐释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好著作。事实上, 在欧美学界, 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关于当代中国和流动人口最重要的文献, 曾经获得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这样的表述, 更多的人会认为是一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 或者是经济学著作, 但我却固执的要在书里寻找苏黛瑞的法学路径。她所揭示的市场、农民流动着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让我们看到, 流动着的中国农民工是如何在完全不利于生存的制度背景下生存、抗争, 并且催生一种新的公民权模式。我想说的是, 这本著述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作品, 已经明确把“公民权”这样具有法学意味的关键词作为她思考的核心三。比如她说, 城市户口其实就是公民权的标志, 而对农民的权利的剥夺其实就是对农民公民权的剥夺。而从整个中国的转型来看, 主要又发生在国家与农民迁移者之间。

这样的表述, 真是宅心仁厚。中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的确就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的确就是一个公民权的问题。可叹的是, 苏黛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站在了这样的学术高度, 而直到今天, 中国内地的学者们似乎还站在所谓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力需求, 或者是工业化拉动农民工的就业这种低层面的立场上, 活生生置农民的权利与自由于不顾, 好像他们天生就不配享有自由发展的公民权利。少数学者如秦晖提出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概念, 在我看来本意是批评中国的低人权现象, 不料并不被受众理解, 原因在于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接受低人权竟然可以成为优势的事实。但无论如何, 秦晖站在人权的高度思考中国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虽然这样的学术立场, 15年前, 苏黛瑞早就已经写成了一本杰出的文献。

中国的所谓转型究竟会走到哪里去, 相信太多的人和我一样, 充满了迷茫。我想正是这种迷茫中的期待, 导致很多读书人最近都爱读台湾青年廖信忠写的台湾转型的个人印象, 《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2009年11月)。我也看了, 虽然台湾这些年同样也有大陆此起彼伏的荒谬, 但印象更加深刻的, 还是蒋经国的个人作用。我甚至无法设想, 要是台湾没有蒋经国先生的话, 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起前一段时间仔细研读的一本书,



出版, 2009年11月)。我也看了, 虽然台湾这些年同样也有大陆此起彼伏的荒谬, 但印象更加深刻的, 还是蒋经国的个人作用。我甚至无法设想, 要是台湾没有蒋经国先生的话, 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起前一段时间仔细研读的一本书,

《韦伯政治著作选》(马克斯·韦伯 著,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 编选,阎克文 翻译,东方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韦伯对政治人的二分法,就是圭臬。在韦伯看来,一类人是靠政治为生,一类人则是为政治而生。他们可能都是以政治为业,但精神本质却不可同日而语。前一种情况下,政治人多以政治为职业,也就是靠政治混饭吃,无论这种饭是寒酸还是阔绰,是洁净还是齷齪,无论那吃相是高雅还是下作,终归是把政治当成了食槽子。相应的,“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崇高情结的政治家(P190),因为,这种人是把政治为志业,是把从事政治当成了一种使命,一种社会进步的召唤。

沿着这样的思考,韦伯认定,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必然要具备三个前提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P352)。这三种素质对于有权参与转动历史车轮的人来说,是决定性的。译者阎克文显然对这三种品质赞美有加。他说,这里的激情,是一种真诚投身于一项事业的观念激情,与癡病性的浪漫主义亢奋毫不相干,这使得他们与常人有别,与政治官僚、行政专家和政治半吊子有天壤之别,他们知道自己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纵横捭阖,没有理由奢望借助权力去冒充天使或者圣徒,同时也没有理由堕落到滥用暴力去掩饰弱智、怯懦和虚荣。我觉得这样的解析,多多少少有点蒋经国的影子,想起国内的那些装城府、保官位,一辈子只知道对立统一规律的所谓政治家,蒋经国先生的确值得称道啊。

阎克文兄果然是语言凶猛。记得上次我和阎克文深聊,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一个工厂里的车工,白天趴在汽车底下拧螺丝,晚上捧着英文原版的学术著作死磕,几十年之后,居然成为国内韦伯研究的高手。我和他有个还算精彩的对话,等几天我把它整理出来,他的家世,他的阅读,他的愤怒,他的思考,让我真的觉得,没有上大学绝对是现代中国人可能觉醒的好路径之一,而那些读过大学,在大学里听组织话的人们,90%都长成了一个只会消费、只会装逼,但却不会思考的木偶。

(文中图片依次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烟火“大脚印”和摄影师宋朝的作品“矿工”)

ESSAY&STORY 散文·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 zhubai@to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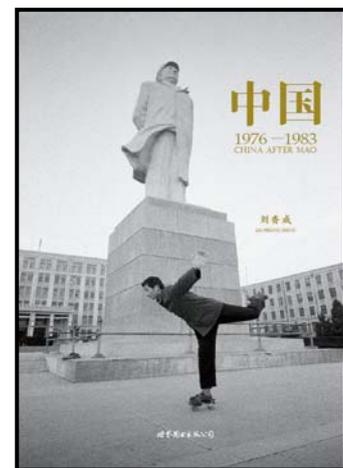
这个季节,人们都在积极为年底作准备——惦记年终奖、准备订票回老家、期待密集的节日来临,最起码也应该多去电影院看看贺岁大片吧。说到这个季节的贺岁大片,实在是一件让人羞愧的事情,自从冯小刚当年开启了贺岁档之风后,我们的华人导演开始轮番上阵,争抢这块到了今年已经据说已有 20 亿元的贺岁市场。仍然还是第五代领衔,开始集体向市场发力,这本不是什么坏事,但却造成了很差劲的结果,就是每到此时,成了一次集中检阅华语烂片的时节,可以毫不气馁地说,中国电影正如中国足球一样,世界杯也进了、联赛也升级了,可是水平却未见什么提高。从某种悲观主义的角度上来说,中国电影、中国足球和中国当代文学构成了一组外型不够靓丽、舞步生硬、歌声难听的拙劣三人组合,将他们放在一起看,绝对是对这个时代中国大众最残酷的打击——作为受众和文化指向最庞大和明确的三个项目,我们落后又何止十步、百步。落后也许还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我们自己人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总是捋着自己的胡子在那说一些道貌岸然的胡话、傻话。我不相信陈晓明、王蒙身在中国文学腹地这么多年后,会真心得出一个“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我能问问王蒙说的“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里的“文学”具体是什么吗?只有所谓的环境,没有相应的作品,这个“最好”也太标题党了。再说“文学”有个屁环境呢,如果有,

车工、木匠、医生……任何人都有环境。环境摆在那里，该说说作品的质量了，不用刻意地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只需稍稍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就会知道，中国当代已经许久没有打动人的作品了，更别提有什么可以深刻反应这个时代或者与这个斑杂的时代相匹配的真正作品了——这，已经是常识，容不得任何人妄论。如果不顾及常识地一味念好，只能成为中国文坛的“假球”事件。

在大家纷纷喜欢自欺其人的时候，我们或许不应该总是被这些虚妄打扰，换句话说，不管哪个时代都会充满陷阱和谎言，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更多地遇见那些美好的东西，这才是活着。一个俄罗斯人，逃亡到美国、欧洲，然后由一个新西兰人为其树碑立传，这有点神奇。《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上下册）》（布莱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8月版）称得上是一部精彩有效的书写，即便你不是纳博科夫迷，也会为博伊德入微的考证、趣味性的写作陷入对一个作家的向往。这也正是一部本对于纳博科夫的读者来说非常简单好读的传记，作者从纳博科夫的毕生作品和接近无限的材料中（这一点你从他近30页纸的参考文献目录就知道了），找出一块块可以织补起来的布料，然后细针密缕般将之一针一线地编织成有序有逻辑的纳博科夫成长史和生活史。仅从博伊德破迷般地找到他精心埋藏的故事和个人往事，然后再与他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形成无比真实和细节充足的生活全史，就足以称得上是纳博科夫最权威和专业的读者。作为一个最专业的读者和非常执迷的拥趸，布莱恩·博伊德用的是纳博科夫读者最熟悉的方式，即用纳博科夫的讲述方式来讲纳博科夫的个人故事。

曾经有一部美国电影叫《杯酒人生》，改编自“美国下层人民的桂冠诗人”布考斯基的小说，“酒”是布考斯基笔下人物以及他自己血液里的必然基因，我觉得“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人生状态。跟酒有关的小说《杯酒留痕》（另译“遗言”，斯威夫特著，郭国良、陈礼珍译，译林出版社 2009年9月版）也是一部心水之作，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作家不对一件事有过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来这样迷人的文字的。这部1996年布克奖作品诚实地告诉了人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不那么时尚，也不那么高雅，甚至也不那么光彩的人，他们同样是人，同样活着，无论精彩与否。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更早的一点介绍到中国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学游泳》（郭国良、叶镒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年10月版），这些早年短篇小说显得斯威夫特更青涩，更看重技巧，却也更加直接地指向生活的本真面目。

最近出了一批当代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垂直之旅》（恩里克·维拉-马塔斯著，杨玲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9月版）是刚刚不久前出版的，加上之前介绍过的《来日无多》（胡安·马德里著，赵英译，2009年9月版）、《对镜成三人》（胡安·何塞·米利亚斯著，周钦译，2009年9月版），算得上在这个有点冷的冬天向“西班牙文学”致敬的意思了。《垂直之旅》探讨的是老年人如何挣扎着继续存于社会和家庭生活之中，孤独在所难免，可能如何打破现实壁垒才更是老年人需要解决的。



一直以为此时的中国，是最需要表达的中国，不管是语言艺术，还是图像艺术，我们实在是太缺少能够对当代社会生活发言的作品了。倒是这本摄影集《中国：1976-1983》（刘香成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1月版）从“外部”向“内部”发出了声音。称之为“外部”是因为本书作者刘香成是美籍华人，他的视角是国际的视角，胆识也是国际的胆识，只有镜头背后的内心是华人的，“外部”的原因还是因为本书自1983年由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出版以来，在世界反复出版、再版多次，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来到它所展现的中国。刘香成镜头下的中国，也许会让人发现历史并不是什么沧桑的东西，而是活着的人的某一块局部身体或者人们的某个生活细节，这是洞察一个国家变迁的最真实的角度之一。

（文中左图拍摄于1980年代，为刘香成作品，右图为卢广新作）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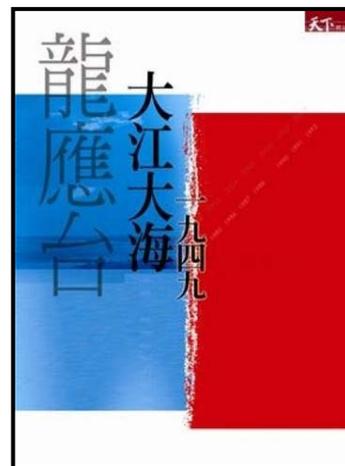


上个月的读书报告中,我在文章结尾处表达了自己尚未读到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遗憾,没想到不几日后,我就收到一位读者朋友发来的简体字版电子书,心里真是平添了几许的温暖与欢快。更让我未曾想到的是,刚入初冬,树木的枝叶还未完全枯落,本城就遭遇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那几日城市颇有陷入瘫痪状态的感觉,据说大白菜超市就曾卖到一棵十元钱。我在办公室里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1版)来打发时光,这雪中读书却更增添了很多令人唏嘘慨叹的滋味。在上个月的读书报告中,我大胆地推测,龙应台写作的精神资源一

是德国留学的精神背景,一是父辈从大陆迁移台湾后的外省人身份,而读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书,却觉得这两个重要的写作视角之外,还有一个作为特殊历史身份的“台湾人”视角,正如她在此书的题记中所要表达的,这是一本“失败者”的后代所写的历史。而这样一个作为“失败者”后代的台湾人,其精神背景既包含着那曾经向学西方的现代思维,也包含着那个难以割舍故土的游子乡愁,还有生长在小岛上非同一般的生命体验,更有日本占领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遗痕,这些种种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因素一起构筑了这册著作的思想情怀。龙应台的可贵还在于,她不愿意仅仅评说历史的胜败,而更多地只想告诉历史的真相,还原那些小人物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中的丰富情态,我特别注意龙应台所写到的那些在日本统治下出生的台湾人,他们在战争中所担负的特殊角色,如今读来颇有吊诡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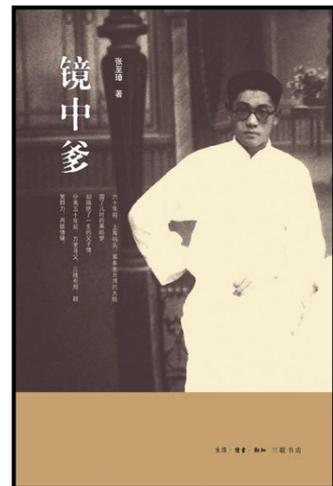
更或者,这还是一个母亲的视角,与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所一脉相承,这册书同样也是写给下一代的,写给她有一半中国人也有一半德国人血统的十七岁孩子斐力普。因此,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她更多强调了每一个生命的珍贵与每一份亲情的伟大,在历史原本的坚硬与宏大面前,这种细微、柔软与温暖却因此显得更加的重要,而如果要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读这册书,在被那些历史细节所要震撼的同时,几乎就是要完全窒息了,特别是大风雪中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龙应台追述父亲和母亲一九四九年从大陆逃亡台湾写起,然后开始不断地续写那些不同生命在历史的转折时代里的命运,他们或者仅仅因为时代的偶然抉择,便因此而彻底改变了人生,但也有更多人在战火离乱的年代里根本无从选择,面对历史,他们仅仅只能是被动的承受。龙应台以史料和口述相结合的方式,加之她那支带有感情的笔锋,让人一读之下便难以释卷,许多文字、许多细节、许多场景仿佛都是历史的记录片,现场、鲜活、打动人心,又使人心灵颤动,而那其中又饱含了一个作家充满真挚的母爱之心。我记得读她写国共在盐城的一次战斗后,一群士兵在城内生火做饭,发现采来的水都是红黄色的,后来一位士兵因解手搬动一块石头,却发现下面竟然是一支穿着军服的手臂,后来再挖,便是更多的共产党军队的战士尸体,“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而挖出来的国民党部队的尸体,“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目铁青,但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龙应台感慨:“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六十年前的国家此刻,同样是大雪,但却让人感到恐怖和荒凉:“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多么



像是电影的画面或者记录片的片段，带着我们瞬间回到那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间之中。我虽在办公室的暖气热流之中，却有彻身寒气逼人的感觉。读这样的著作，让我更加觉得那些过往历史的复杂、奇妙、幽深，真的比我们如今小说作家的想象能力还要高出成千上万倍。我在这册书中就不止一次的为那些人物命运的传奇与曲折所慨叹甚至拍案，诸如在一九四四年参与空袭日本占领父岛的美国空军飞机，不幸被日本人击中，除一位年轻人意外地死里逃生，其余八名军官，四名被斩首，四名被杀害，成为饥肠辘辘的日本守岛军官的盘中餐，而那位逃生的年轻人则在他六十五岁那年，成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作乔治·布什。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码头，曾为民国政府职员的张维寅身上只有三张通往台湾的船票，无奈之下，他先将妻子和两个幼子送上船，而自己只能再作打算，设法随后在台湾会合。但没想到的是，张维寅最终没有能够到达台湾，且不久便与先期到达台湾的妻小失去了联系，从此音信全无。四十多年后，张维寅的儿子张至璋写出了一篇十分感人的追忆文章《镜中爹》，抒发他与父亲失散后的万千感情，这篇文章后来也成为他写成自传体著作《镜中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1版)的缘故。此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篇讲述作者和母亲在台湾生活的故事，点点滴滴，记忆如细雨入夜，但处处无不渗透着与父亲离散的遗憾与哀怨？下篇则是张至璋到大陆寻找父亲踪迹的记述，这一部分则如侦探小说，一波三折，层层揭开父亲独自在大陆生活三十年的故事，读来让人唏嘘感慨。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作者特意将父亲与自己的人生简历进行对比，我细细对照近半个世纪以来父子两人在不同环境中的生活，既能感受到作者作为人子的遗憾，也能感受到不同时局与环境所带给人命运的影响和变化。无疑，这本是一部私人化的家庭历史，但读来却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雨烟云，作者以亲身经历写他与母亲及姐姐等亲人在台湾生活的细节，既亲切真实又生动有趣，同时也自然道出了台湾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万象与历史风云；而他追述父亲在大陆生活的故事，那一件件政治风云与历史往事的叙述，一次次小心翼翼费劲思量的人间求存，都包含着一个普通的“失败者”对于未来的美好希冀、期待与渴望。可以说，张维寅的人生命运不仅仅代表一个人，他更是一个时代大变革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册书读完，我为这半个世纪的家庭离散所引发的人间故事久久感慨的同时，也从其中领略到一个民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风貌，不由得叹息那曾遗落的风韵，而今却如烟云散去。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周志文跟着母亲从广州乘坐轮船准备到台湾，但因为途径的香港不让停靠，只得转经海南，再有一年多，他们才历经艰难，辗转来到了台湾。作为国民党军人遗孤的周志文，最终与亲人流落到台湾宜兰县城的一个无名小镇。在兵荒马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生命中有太多相似的体验与感受，但在周志文的记忆中，那遥远的大陆故土却慢慢地被淡忘，倒是台湾的小镇永远留在他生命记忆的深处。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对于故乡的理解：“我常想‘故乡’是什么。小时候听人家唱一首歌名是《我的家在大陆上》的歌，家在大陆上表示没有家，因为大陆太大了，说我的家在大陆上跟说我的家在地球上有什么分别呢？故乡应该是个小地方，是以自己家为核心，由亲戚、同学、同事朋友所形成的一个不太大的‘聚落’。故乡是对于一种习惯的称呼，这习惯包括吃东西时的甜咸口味，对空气湿度、色彩明暗的反应，还包括形容词的用法、吃甘蔗时要带皮吃或不带皮的吃之类的一切生活细节的态度，故乡假如不包含这些，故乡就只是一句空言。”因此我读周志文的散文集《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1版)，就很能体会他留在少年记忆中的那些或忧伤或温暖的故事，那些与他有着密切联系的生命尽管如此的平凡、普通甚至卑微，但他们构成了一个人关于故乡的重要因素，成为填充个人记忆的重要角色。也因此，他乡终究要成为故乡的。周志文的散文温婉、干净、忧伤，有一种六朝笔记的韵味，读来如前朝旧事，这样的笔法写那些记忆中的故人故事，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琐碎与庸常，反倒有一股清气挥之不去。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记忆和感受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柏杨、聂华苓、林海音这样对故土有所记忆的是一代人的话，那么龙应台、张至璋、周志文这样对故土只能依靠父辈的记忆来触摸的一代人，便已经完全脱胎为新一代台湾人了，所以周志文才会有这样的慨叹：“因为有他们，台湾才不显得那么浮夸，显得比较真实，台湾这个地方更像我们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周志文跟着母亲从广州乘坐轮船准备到台湾，但因为途径的香港不让停靠，只得转经海南，再有一年多，他们才历经艰难，辗转来到了台湾。作为国民党军人遗孤的周志文，最终与亲人流落到台湾宜兰县城的一个无名小镇。在兵荒马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生命中有太多相似的体验与感受，但在周志文的记忆中，那遥远的大陆故土却慢慢地被淡忘，倒是台湾的小镇永远留在他生命记忆的深处。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对于故乡的理解：“我常想‘故乡’是什么。小时候听人家唱一首歌名是《我的家在大陆上》的歌，家在大陆上表示没有家，因为大陆太大了，说我的家在大陆上跟说我的家在地球上有什么分别呢？故乡应该是个小地方，是以自己家为核心，由亲戚、同学、同事朋友所形成的一个不太大的‘聚落’。故乡是对于一种习惯的称呼，这习惯包括吃东西时的甜咸口味，对空气湿度、色彩明暗的反应，还包括形容词的用法、吃甘蔗时要带皮吃或不带皮的吃之类的一切生活细节的态度，故乡假如不包含这些，故乡就只是一句空言。”因此我读周志文的散文集《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1版)，就很能体会他留在少年记忆中的那些或忧伤或温暖的故事，那些与他有着密切联系的生命尽管如此的平凡、普通甚至卑微，但他们构成了一个人关于故乡的重要因素，成为填充个人记忆的重要角色。也因此，他乡终究要成为故乡的。周志文的散文温婉、干净、忧伤，有一种六朝笔记的韵味，读来如前朝旧事，这样的笔法写那些记忆中的故人故事，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琐碎与庸常，反倒有一股清气挥之不去。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记忆和感受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柏杨、聂华苓、林海音这样对故土有所记忆的是一代人的话，那么龙应台、张至璋、周志文这样对故土只能依靠父辈的记忆来触摸的一代人，便已经完全脱胎为新一代台湾人了，所以周志文才会有这样的慨叹：“因为有他们，台湾才不显得那么浮夸，显得比较真实，台湾这个地方更像我们

的故乡，值得我们为他珍惜而忧伤。”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笔者在上月的阅读报告中，曾粗略地描述了中国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传统，分别提到了史华慈与马丁·布伯这两位西方思想的相关论述。碰巧的是，本月在书店里又发现了一本以中国神秘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译著：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中国思想史》（常喧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初看书名，颇让我诧异，史怀哲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并不算陌生，他的传记《史怀哲传》（钟肇政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早已在国内出版，乐迷知道他是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他写的《论巴赫》是巴赫音乐方面的经典；有的读者了解他，或许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敬畏生命”的论述，以及他在非洲筚路蓝缕，为当地民众服务，有如圣徒，最终获得了195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同获和平奖的还有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不过后者却不像史怀哲这样众望所归。

这本《中国思想史》的写作时间，是史怀哲远在加蓬的兰巴雷内(Lambarene)行医期间，他为何要以中国先秦思想作为研究主题，或许还是有感于一战后欧洲思想的荒漠化倾向，而道家的那种肯定生命的“神秘主义”以及孟子的自然伦理观却强烈的吸引了他。粗略地讲，东方文明中肯定现世，肯定生命的思想倾向与西方否定现世的救赎思想的紧张感，一定强烈地吸引了史怀哲试图从东方思想找到一条重建伦理的路径，至于这种研究是否在学术上严谨与专业，则并非史怀哲所真正关切的问题，这也使得这本未完成的书稿在2002年才在德国正式出版。

不过由于这本书涉及的问题既广且深，粗略一瞥自然无法洞悉全书，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比较，虽然前有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发其端绪，但是最终却被现代化的潮流一路裹挟，直至今日，面对史怀哲这样的著作，也让我们不得不深思，我们对自己的先秦思想传统，到底认识几何？哪些又为后世的演变而遮蔽，或许这些都是极难回答的问题，却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史的重大问题。

提到思想史，最近恰逢独立阅读的撰稿人刘柠兄来沪，向我推荐一本矢代梓的《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学林出版社，2009年1月），粗粗翻来，令我大开眼界。矢代梓是日本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学者，有趣的是，他的职业却是中央公论出版社的编辑，日本的媒体出版行业水准之高，不得不令国人汗颜。

该书体例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是以大事记的方式逐年记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就拿1931年到1940年间，我就读到了霍克海默、科耶夫、列维-斯特劳斯、海德格尔、萨特、米德在当时的活动记录，这些内容尽管并不算新鲜，但是以这样的体例编排下来，思想史的脉络感呼之欲出，这种工作尽管吃力不讨好，但是做出来却是功德无量。

读到此书，也让我想起最近托朋友复印的一本《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竹内实等著，程麻译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7月），该书有两个特点或许可以“留传书史”。一是其详尽概要，诸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从1895年开始，逐年将每年度的思想论争与相关历史事件以表格的方式列出来，并附有相关史料备注，这种详密而费事巨大的工作，足以让后来的研究者都受惠于其成果；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其价格，这本978页的书定价高达1580元，合下来每页约1块6毛一，我并不了解出版社为何如此定价，但是对于我这位“专业需求者”而言，可能创下来最昂贵的“页均价”了。

刚刚在“季风书园”买到茱迪·史卡拉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1月版），之所以敢这么迅速地推荐，当然是来自于对作者的信任。史卡拉在美国政治思想史领域赫赫有名，尽管她并没有



发展出一套如罗尔斯那样的规范政治理论，但是她其实提出了一套不同于罗尔斯的对自由主义的界定：“自由主义者相信残酷乃是我们所最恶劣之事”，这套对自由主义的预设来自于她对乌托邦政治思潮的厌恶与反感，因此在她的思想中，“节制与怀疑”乃是自由主义论述的基本预设，尽管从学理上看，这个论述不够详备、不够深邃，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定义却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任何一种政治思想谱系，只有它不反人类，或许都不得不同意这样一个共识，这或许也是虽然自由主义理论不够缜密，但是却能维系美国政治的真正奥秘所在。

独立阅读最近举行了两次活动，现场互动相当热烈积极，也让我有机会见识独立阅读的小和兄与刘柠兄的即兴演讲风采，可见“以文识人”与“现场感知”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换个角度说，“书”与“人”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天我们大多喜欢网上订书，但是在书店中与书“摩肩擦踵”的温情感却荡然无存，上海的书店举步维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季风书园，但是也会有像“开闭开”这样的小型诗歌书店陆续开张。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上海的书店“集体消失”，阅读该会是何等的单调与冰冷？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直至郑念女士去世，我才知道拉斯基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位优雅的女弟子。在《洛克菲勒回忆录》（曹彦博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里，拉斯基被称为“左派的花衣魔笛手”，但是他的中国弟子陈西滢、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大都被视为“右派的牛鬼蛇神”。这些人中，除了陈西滢全身而退，其余诸位都是命运多舛，徐志摩死于空难，罗隆基孑然一人、寂寞离世，王造时死于狱中、子女精神分裂，储安平不知所踪。郑念也不例外，1966至1973年被非法拘禁，独女死于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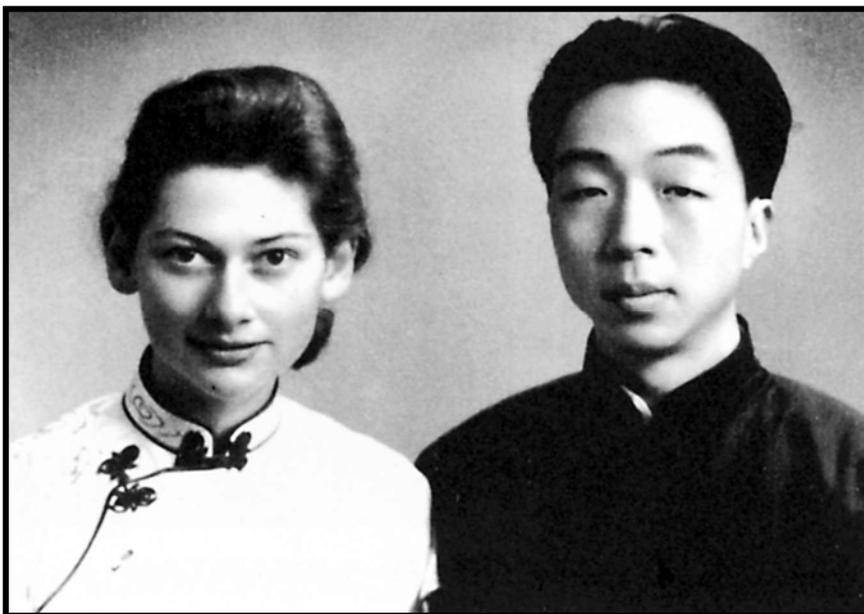
郑念离开大陆之后，撰写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引起欧美各国关注，阿瑟·米勒等称赞有加。这本书有很多中文译本，大陆有《生死在上海》（方耀光等译，百家出版社，1988年8月）、《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又署名“程念”，苏帆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上海滩的沉浮》（署名



“姚念媛”，华克健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台湾有《生与死》（郑凯译，敦煌书局，1986年9月；大鸿图书公司，1987年）、《上海生与死》（梁馥云译，龙和出版，1986年12月；曾国清、陈小安译，新陆书局，1987年8月，据称是“唯一合法授权中文版全译本”）。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的著作，两年之内至少有七种中文译本，也算是一个创举了。昔日的文学青年陈凯歌，曾经准备把郑念的这本书拍成电影，后来下落不明，只见他折腾出一部《无极》，举国喜闻乐见。

阅读这本书，让我最为感慨的不是郑念的遭遇。夏天刚刚读过戴晴女士的《在如来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对于取得举世瞩目辉煌成就的当代中国史，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让我感慨的是这本书居然可以在1980年代公开出版，虽然有的版本象征性地注明“内部发行”，但它还是成了当时的流行书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

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为了保住面子而杜撰的。他们没有勇气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失败。”看到这种句子，我这种胆小如



鼠的读者不免心惊肉跳，放在今天，即使供批判用，这种书也没有重现天日的机会。这两天在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发微》（三联书店，2009年9月），非常温和的文化著作，还是不时地见到省略号，并且没有交代这是钱穆的省略号，还是出版社的省略号，但从上下文来看，多半是后者。再想想戴晴当年的《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如果再版，恐怕要俟河之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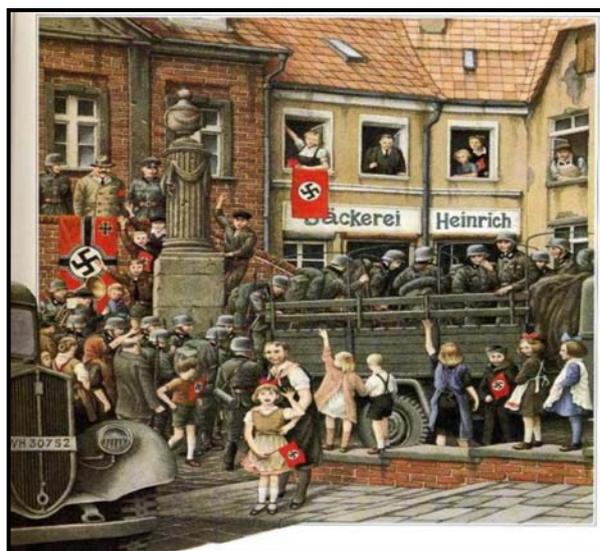
杨宪益先生与郑念女士同年同月出生，同年同月去世。两位生前没有往来，但是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介书生，都无法逃离疏而不漏的恢恢

天网。最终，郑念用脚投票，漂洋过海，杨宪益坚持留守，大有把牢底坐穿的决心。虽然杨宪益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早已出版，但是删节过多，很多事件语焉不详，比如他在5月35日接受BBC广播公司的采访，就完全不见踪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雷音女士撰写的《杨宪益传》（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10月），看看为什么季羨林先生称“杨先生骨头硬”，钱锺书先生会盛赞他的旧体诗。书中还讲到5月35日之后英若诚“三顾茅庐”，杨宪益拒不悔改，建议这位文化部副部长“七擒孟获”，我查找了《水云在：英若诚自传》（张放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不知道是删除了，还是英若诚“遗忘”了。不过，《水云在：英若诚自传》依然值得一读，这本自传同样是从监狱开始，开篇一个章节标题就是“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1980年代有“大墙文学”一说，似乎可以由此衍伸出系列产品，诸如“大墙传记”、“大墙历史”等等。

郑念、杨宪益讲述的都是往事。可是，在“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时代，在一个“女企业家自焚抵制暴力拆迁反被定性暴力抗法”的时代，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也相形见绌了。每当看到这种新闻，我总是想起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张孝祥尚有扁舟一叶，杨宪益只能漏船载酒。或许，我们最好接受《武林外传》里吕秀才的教育，他为郭芙蓉独家打造的“平暴（躁）”秘方，是默念无数遍：“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所以，在这里，我准备放弃事先准备推荐的容易让人“暴躁”的学术著作，转而推荐几本童书，为读过郑念、杨宪益传记的朋友压惊。一本是意大利画家罗伯特·英诺森提的《铁丝网上的小花》（代维译，明天出版社，2007年7月），买下此书，是因为我在网上偶遇书中一幅图画，一个德国小镇的男女老少，挥舞着纳粹的旗帜，依依不舍地欢送镇上的男人参加纳粹军队。我们面对历史，总是天真地以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可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像书中的男女老少一样，“很傻很天真”。

“很傻很天真”不算最为糟糕，可怕的是“很傻不天真”，融愚不可及和老奸巨猾于一体。我向往的是“不傻很天真”，“大师经典哲学绘本”（[德]莫妮卡·菲特著，安图妮·波阿提里思克绘，王星译，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10月）满足了我这个需求。这套书共有四本：《画家、城市和大海》、《当颜色被禁止



的时候》、《收集思想的人》、《擦亮路牌的人》，在这套书里，我找到自己的理想，不是画家、不是收集思想的人，而是擦亮路牌的人。一个路牌清洁工，负责清洗的大街小巷以音乐家和诗人的名字命名，有一天他突然对这些陌生然而著名的名字产生兴趣，下班之后开始冲向音乐厅、歌剧院和图书馆，每次擦洗路牌时也会自言自语，对那些音乐和文学作出评论，后来他发现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听他自言自语的公众，他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清洁工，但他依然做他的路牌清洗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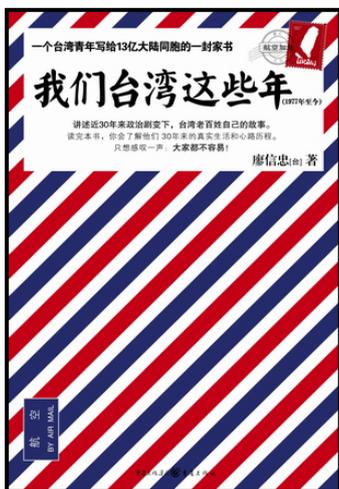
做这么一个路牌清洁工，需要很多奢侈的条件：比如你不会居无定所，或者有了住处你不用准备燃烧瓶或者准备自焚，以对抗“合法拆迁”；比如你的收入和闲暇要保证你可以出入于音乐厅、歌剧院和图书馆；比如你的自言自语获得公众关注之后，不至于被称为“非法集会”，不至于被视为“不务正业”。总而言之，你不能生活在一个颜色被禁止的国家。在颜色被禁止的国家，人们像影子一样掠过，所有的墙都仿佛有了耳朵，一旦有人散布谣言，就会被士兵带走，甚至连彩虹都不被允许存在，只有伟大领袖和他的马车是闪闪发光的。童话毕竟是童话，最后出现了一个据说会用巫术的老太太，她让伟大领袖签字允许颜色重新出现，让伟大领袖允许百姓们选举自己的总统。注意！老太太没有取而代之，而是提出“民选”，可是在一些颜色被禁止的国家，学者还在论证“民选”如何不适合国情。注意！这位独裁的伟大领袖和他的部长们，没有被愤怒的群众送上断头台，而是坐上火车，被驱逐到另外一个国家。看到这里，非常感慨，如果希望生活在一个颜色不被禁止的国家，阅读需要从娃娃抓起。在一个颜色被禁止的国家，做一个幸福的路牌清洁工，都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理想。

(文中图片依次为郑念女士与女儿合影、杨宪益和戴乃迭合影及铁丝网上的小花一书插图)

BOOK REVIEW · FOCUS 书评 · 焦点

一本对台湾缺乏热情的书

沈宇哲 (广州 tvbsettv@gmail.com)



有一篇大陆中央级媒体新闻稿的标题叫“台版韩寒”廖信忠实话实说《我们台湾这些年》，读后顿感如鲠在喉、如芒刺背。最初，由于未读过书中内容，一时半会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但等看完这本“矫情”的书后，这种感觉非但未曾减轻，反而愈加强烈了。

两岸隔膜 60 年，随着近年来国共合作方兴未艾，民间交往日趋热络，这股风潮引领着台湾海峡的形势从“台独备战”的阴影中缓步走出。继而在马英九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后，官方互动也渐入佳境。唯独在热火朝天的“亲情沟通”中缺了纯民间的声音，而这种缺憾显然又不可能由连战、郁慕明、宋楚瑜等退出政坛的“民间人士”来代表，于是沟通断层即可出现。然而，因为这种沟通在现实利益上的交集并不突出，非特定对象的交流也就无所谓动力，哪怕这样的便利性随着直航的实现变得越加容易，但始终不见两岸人民之间有过或可能存在交流了解的愿望。

本书的出现其内容早在天涯论坛上连载，集结成册后，面临大陆在地化的政策原因，网络行文未必如实地反映到书中，此为本书遗憾之一。

此书的主旨体现在封面上，有一句开宗明义的阐述：本书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显然，政治变革是该书吸引读者眼球的主要切入点，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对台湾政治演变本身的理解，及其后在公民社会中的作用都未能有深入解析。

众所周知，台湾之所以吸引大陆人民的目光，并不纯粹地集中于领土主权问题，所谓“台独”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变得越发不可实现，两岸交流的争议于是便就落在了既不能达致统一，独派又经历了陈水扁政权的折腾未能梦想成真后，进退不得的尴尬处境下，两岸未来在哪里。也由此，学界层出不穷地擎画着“两岸一中”、“宪政一中”、“邦联制”等政治蓝图。

除了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关切书中的内容，更主要的一点莫过于台湾的30年就是逐步走向民主的30年，在这不短的日子里，从最初“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治理下的蒋氏威权政府，渐进式过渡到人民与政府就政治权利的博弈、党外抗争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民众有组织或自发的集会游行，都是台湾步入民主转型期后，不容忽视的经验教训。

诚然，大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苛求小人物做到事事关心，他们自然也做不到对每个重大节点事件都有深刻的理解与刻画，但在这种大潮流下，从“立法院”增选“立法委员”、“国民大会”增补“国大代表”的缝隙中，民主观念在形式上至少开始被人民接触。哪怕这种初步的碰撞还处于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控制下。

随着蒋介石进入人生的晚年，对国是不再事必躬亲，儿子蒋经国的治国态度颇为积极。在不威胁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前提下，台湾各地方的基层选举是有大量空间得以喘息的，正因为有“合法空子”可钻，才造就了施明德、许信良、林义雄等一批党外运动领袖走上前台。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来谈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大致可以分为国民党体制边缘蠢蠢欲动的民主胎动；到了1970年代党外势力凝聚，通过地下刊物、散发传单、开坛讲座等方式方法，试图启蒙台湾民众去认识、了解、拥抱民主理念。

用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一切：1977年的一天，桃园县中坜市的一个眷村村口来了几个人，眷村的人都痛骂他们是“汉奸”、“忘恩负义”，不让他们进村子发传单。这几个人没办法，只能客客气气地在村口玩耍的小朋友帮忙发，但大人们马上制止，小孩子们立刻也跟着大人一起骂“汉奸”之类的话，几个人最后走了。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很客气地来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终于，有一天，眷村里有个人问了句：“你们为什么要跟国民党作对？为什么要骂国民党？”这几个人中就有一个叫许信良的36岁年轻人把自己的行为介绍了一番。

这批人凭借自己的耐心，感化着尽可能多的台湾老百姓，这等党外运动的范围及影响力在当年的台湾社会是绵密但不张扬的实力。这与作者一副身处其外，更像是个眷村居民的形象，当然此为遗憾之二。

上述这个小故事除了折射出威权时代党外运动的现状外，还牵出了另一个“伤疤”——省籍矛盾。一个是台湾社会迄今为止裂痕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社会话题。即便民主思潮如火如荼，也不曾丝毫降低其对抗的烈度，只是每次引发族群争议的导火索不同而已。事实上，在台湾戒严的年代里，本省人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是全方位的，无论从严肃的党禁报禁等政策方针，还是搞笑的“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弟”的警方问话，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时时处处都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密关照。

正因为这样的政治大气候，导致本省人普遍同情并乐于帮助党外社会活跃分子，特别在诸如美丽岛事件及其军事大审、林义雄灭门杀人案、蓬莱岛案引发万人送陈水扁入监服刑；五一九龙山寺绿色抗争行动、郑南榕自焚等指标性社会事件，台湾意识急速抬升。这股意识形态的形塑，是导致十几年台湾民众对执政前的民进党持友好态度的关键原因。

所以，对于作者号称自己是本省人，却在对待民进党和他背后的绿色民意时，明显有失偏颇地选择了戏谑、讥讽等不屑态度，这种取态本身就是一种不客观中立的表现，更有违作者矢言告诉读者一个真正的台湾的本意，此为遗憾之三。

真实的了解一个社会需要对等、尊重、平和、客观地去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台湾作为浸润着深厚大中华文化底蕴的岛屿，她对大陆人的魅力是不言而喻的。诚然，30年来的台湾社会发展脉络对照今日的大陆，能起到镜子的反射作用。但我始终认为，两岸消弭隔阂的终极目的在于和平，是一种基于互相认同、欣赏、包容的民族感情，也是一份质朴、豁达、平和的交流态度。

这是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热情，却对台湾这块土地缺乏热情的作品，就像一封寄给自己的情书，但愿他不会误导你欣赏台湾的视线。

你们知道浊水溪的长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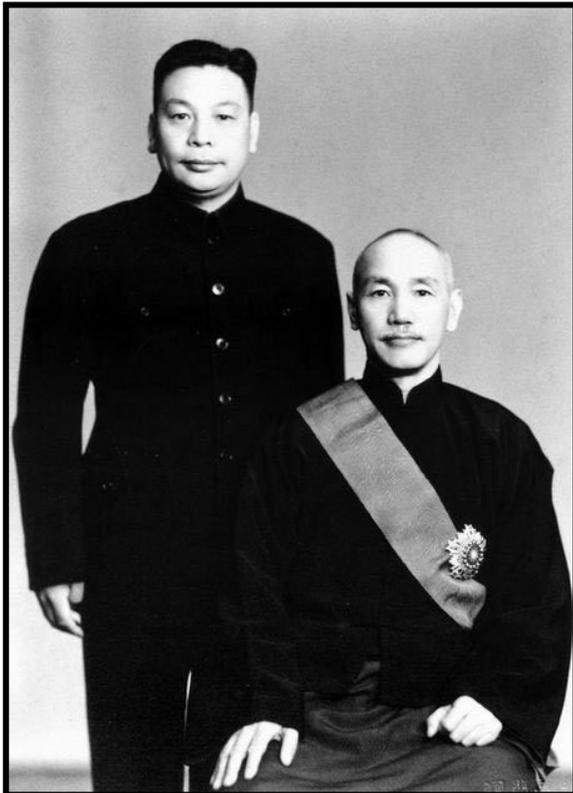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贾葭（北京 jjjia80@gmail.com）

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教育会馆，是1931年日伪时期修建的三层西式建筑，外表颇像老上海的先施公司。这幢被列为古迹的建筑最近装修一新，作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之馆舍，后年对外开放。马英九在11月26日致辞时表示“无比

欣慰”。二二八事件发生 62 年之后，国民党已经基本洗清“原罪”，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受到诘难。

其实，在 1991 年国民党宣布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一直不停地就 38 年来的独裁统治向台湾民众道歉，国民党大佬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二二八追思会。1978 年美台断交以来，台湾政治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转型时期，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标志着台湾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体系。

最近，《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引起许多大陆读者的关注，便是因为“这些年”正好就是台湾的转型时期。作者廖信忠，1977 年生于台湾，目前在沪工作。“廖信忠”这个笔名纯属偶然，是一个大陆记者对他的化名，他便拿来用了。这本书是他自己三十年来的个人编年史。作者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像流水帐一样记录了自己的前半生及当时的台湾政治与文化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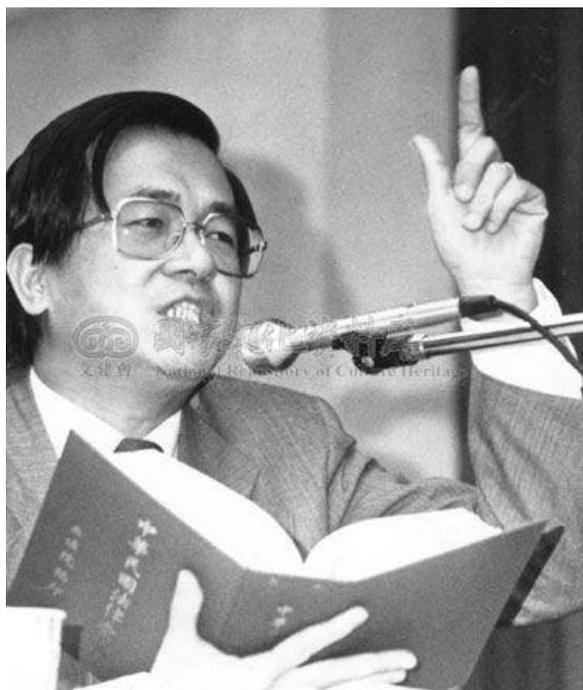
台湾政治巨变发生于作者的少年时期，他参照了编年大事记再加上自己的回忆娓娓道来，虽然看起来颇有两层皮的感觉，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出，当年台湾民众为摆脱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如何艰难地站了起来。而这段历史，却不为大陆民众所知。在连战登陆之前，普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印象只有两个：这是中国的一部分，曾经为国民党统治。

1979 年美台断交后，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曾发表言辞铿锵的抗议，民间歌手侯德健当时发表了著名的歌曲《龙的传人》，由著名歌手李建复演唱，以鼓舞台湾民众之信心。后来张明敏翻唱之后，传至大陆。在 1989 年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晚会上，作者对歌词做了小小修改，后来长期是大陆 KTV 包房的必点歌曲，2000 年王力宏又翻唱过一次。但是很少有人晓得这首歌的来源。

同样来自台湾却在大陆广为传唱的歌曲，还有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1985 年台湾首次演唱，随后被国民党拿来竞选主题曲，罗大佑因此怒而不回台湾。我 2008 年在台湾观选之时，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蓝绿两党的选举造势晚会上，候选人都会用闽南语唱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马英九、萧万长和蓝营民众一起唱，而在一街之隔的民进党的场子，谢长廷和苏贞昌也在唱这首歌。

从《龙的传人》到《爱拼才会赢》，歌词从“虽不曾看见长江美”到“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这三十年来，暗示着台湾人关于“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结束了，而台湾的主体认同被逐步建立并且得到强化。在这三十年中，国民党做的重要的事情也是本土化，蒋经国在最后也曾宣告说“我就是台湾人”，这毋宁视作是国民党对台湾主体认同萌发的一种反应。

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前，留美法学硕士吕秀莲出版了《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书中提到，“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爱台湾即是爱中国，讲台湾话就是讲中国话，珍惜台湾文化就是珍惜中华文化”。这一论述，巧妙地在“中华民族”这个大框架之下，把台湾人的“中国视角”变成“台湾视角”。这本书是当时党外历史最有系统的呈现，确立了台湾认同的历史叙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萧阿勤认为，这是八十年代党外“台湾意识”的先声。



至今活跃在台湾政坛的绿营大佬，或多或少都与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相关。当时的《人民日报》，还把陈水扁、吕秀莲称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英勇斗士”。许多台湾民众也都认为，这一事件是个人思想启蒙的起点。本书作者提到，“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可见，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与国民党的独裁有着莫大关系。

在整个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对自己的统治毫无信心。1970年，一家电器公司在《中国时报》上刊登录音机的广告，除了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文字广告：“复兴文化的新利器，录音器材的大革命”，“毫毛细语，传真实录”。警备司令部认为这四句广告话暗含“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出报当日上午，即派员到《中国时报》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有关单位和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处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68年1月，作家柏杨翻译了一幅影射两蒋父子的漫画，被判处死刑，在海外华人严正抗议之下，改判有期徒刑12年。殷海光的名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也在这一时期被禁。可以说，在1979年之前，国民党面对的只是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独裁统治的反对，而在此之后，还要面对本土知识分子以“台湾意识”进行的抗争。这让蒋经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1979年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台湾更是风雨飘摇。1981年，布什副总统的幕僚李洁明(James R. Lilley)赴台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忆及当年到达台湾时的感受说，“在大陆关系上面，台湾有一股戒慎警惕、不太有信心的感觉。当它望向美国，实在没把握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不过李洁明迅速看到了国民党的变化。在江南案之后，国民党开始允许候选人公开辩论。政府有些机关忙着取缔党外刊物，也有些机关迅速批准新刊物的登记发行。台湾的法律并没有完全毁灭民主的种子，至少基层自治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稳定的状态。知识分子只是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中央。

民进党的成立无疑是解严的前奏。全台湾的媒体，只有《中国时报》做了报道。据说当时有人劝蒋经国抓人，但被蒋拒绝了。在民进党成立三天后，蒋经国开始研议《国家安全法》，计划解除戒严令。李洁明说，蒋经国认为台湾必须发展出政治、经济的典范，作为在对大陆关系上维持自主、独立地位的根据。蒋经国的特使也向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席格尔转述了蒋的四点方案，民主化、本土化、维持经济繁荣、向大陆开放。而所谓民主化的进程在当时的理解就必须包含解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本书作者提到，在解严前后的几年，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回台的高峰期。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的“黑名单”。当然，还有一些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子，在海外对异议人士进行跟踪和监视，或者替国民党政权在海外媒体上说好话和暗话。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当然更加让民众反感。

当时的人心向背已经很明显。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警察、特务力量，但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太落后僵化了。党外运动大大增加了台湾民众的信心。台湾媒体人彭佳予曾经评论说，当时即便是在国民党党内，也是人心思变。国民党这个执政巨人，在整个 80 年代，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



这种变化显示在很多方面。本书作者提及自己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教材均是以中国视角编撰的。这并不难理解，蒋中正去台之后，向以正统自居，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中正反其道而行之，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认道统来自孔子、孟子、王阳明、孙中山，所以国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要占到八成以上。

地理课更可怕，要“背诵很多我们都不

知道的地名”，要知道，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中国有 35 个行省、两个地方（蒙古、西藏）、一个特别行政区（海南），共 38 个省级行政区域，首都还在南京。当政治气氛宽松之后，授课老师就对现行教材表现出不满。

作者回忆道，地理老师对学生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长江黄河的长度，跨过哪些省，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浊水溪的长度？能不能排列出台湾从北到南的县、市名呢？”这显然是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僵化教育的反抗，中学时期正是学生价值观的形成阶段，教师在授课之余，便会灌输与“中华意识”不同的“台湾意识”。但考虑到当局的态度，许多老师也不敢明讲。

当时台湾每一个单位和机构里，都有一个“人二室”，对该机构人员的政治思想进行监督。我第一次看到“人二室”这个名词，不之解，询之台湾朋友，他查了大量资料后告诉我，全称是“人事处第二室”，专门监督职员是否有违法言论或者行为。

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人二室”，还讲了几个好玩的政治段子，特别像前苏联和东德的情况。“人二室”后来在“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废止后，也被废除，意味着当局停止了对民众思想的监控和禁锢。作者认为，这对思想言论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作者觉得学生时代受教育的毒害过深，当局对学生进行的“填鸭教育”让一切事物都具备标准答案，思考过于粗略，常常流于二分，非黑即白，容不得跟当局不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不过即便如此，但在解严后涌现出的信息洪流，却迅速改变了这一代人对这块土地、对政治价值的认识。

报禁解禁是 1987 年解除的，当时台湾只有 32 家报纸，而 1989 年登记在册的报纸竟然有 384 家，短短两年内，增长了何止十倍。新的报纸杂志纷纷成立。1993 年后，国民党又放开了无线、有线电视台执照，广播频道也因之调整，新的电台电视台也相继成立。

民进党前辈康宁祥在 1989 年成立《首都早报》，1990 年李登辉提名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时，这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干！反对军人组阁！》。当年 8 月 27 日，这份报纸倒闭，三个月后，国民党颁发了“新闻公众服务奖”给《首都早报》。当时的国民党，心胸已然开阔了很多，很欢迎媒体的批评了。这样开放的言论环境一直持续到今天。

早在解严之前，已经有作家回到乡土，建构台湾意识的文学叙事系统。比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锺理和的《笠山农场》、锺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这些作品在八十年代更成为台湾本土文学的经典之作。许多媒体公开讨论“台湾认

同”，知识分子则努力挖掘台湾过去的历史，延续在威权时代已经萌生的国族认同，由此产生了新的一批代表本土的文化产品。

“戡乱条款”的废止，等于国民党对外宣布不再把反攻大陆作为长期目标，而是要进行本土化转型。易言之，本土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台湾认同”，已经逐步取得了主导性地位，而国民党不得不去顺从这种历史潮流。

而后台湾的变化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作者参与 1996 年的首次领导人直接选举，觉得这样的选举简直是个嘉年华，有吃有喝还能玩儿。2008 年选举期间，我去高雄看民进党的造势晚会，“农十六”体育场周边，各种台湾小吃都有，卖风箏的卖工艺品的，狗也在边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抱着孩子去，无非是看个热闹。选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作者写这本书的本义在于，帮助“全然不了解台湾的大陆人了解台湾。”其实台湾人也不了解大陆人。经过六十年的分隔，两岸民众已经非常陌生。所幸 2005 年，国民党领导人来到大陆，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并且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迅速签订了关系两岸发展的九个协议，让海峡的距离变得更短，这绝对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令人欣喜的一章。

台湾人是否会重新捡起《龙的传人》这首歌，如今尚无定论，但海峡在变窄，民众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那些来自于台湾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也影响了几代大陆人，我们实不能低估文化带来的变革力量，这一天，终究不会太远。

（本文图片依次为蒋氏父子合影、陈水扁为美丽岛事件中的当事人辩护【左】、陈水扁 2008 年入狱【右】以及民进党发起街头政治运动之初的情形）

你的美丽，我的哀愁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看到久违的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一面心潮澎湃，一面黯然神伤，想起陈升的那首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翻开《我们台湾这些年》，这种感觉再次浮上心头。作者廖信忠年届而立，按照我们论资排辈的光荣传统，回忆的资格都还没有。但是，他在这三十年间经历的点滴往事，很多草民倾其一生，也未曾感受。

作者非同常人，或者具有特异功能？非也。廖信忠 1977 年生于台湾，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读来，随后考研未遂，然后入伍、工作，“泯然众人矣”。如果寻找一点噱头，他与周杰伦是淡江高中的校友，他的妹妹与周杰伦是淡江高中第一届音乐班的同班同学，书的封面可以印上

“周杰伦同班同学的哥哥的倾情回忆”的字样。但是，这个“远房非亲戚关系”实在太遥远了，出版商没有使用这个拙劣的炒作创意。《我们台湾这些年》的前身，天涯杂谈的一个热帖，从 2008 年 5 月至今，已经有 270 多万点击率，10 万多条回复，这本书完全用不着出位的宣传。

一生的长短，有时和年龄无关，而是取决于时代。廖信忠经历了台湾转型的主要过程，从美丽岛事件到国民党解严到大选。作者是一个在场的旁观者，美丽岛事件、国民党解严，他处在童年时代，2004 年大选，他又在部队之中，现役军人保持行政中立，不能公开讨论选举。我们无法从《我们台湾这些年》里寻找到重大事件的揭秘、亲历，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呈现了一个那么远、又那么近的“美丽岛”。



“民主香肠”和“绿色小组”

关于早期的党外运动，作者想到的不是主义、不是理念、不是候选人，而是“民主香肠”，当时的烤香肠小贩支持党外运动，每次党外人士的场子移动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以至出现“民主香肠”的说法。年幼无知的作者跟着爸爸“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政见会常常有名嘴助阵。民主在精英那里可能是慷慨陈词、可能是漫漫铁窗，但是对于民众而言，他们除了关注候选人的演讲，还有名嘴们妙趣横生的舌头，热乎乎的香肠。或许，有人会说小贩未必支持党外运动，他们只是做生意，哪里有场子，就去哪里买香肠。即使小贩逐利而去，他们的去向也能够说明党外候选人的政见会“有利可图”，说明这种活动人气旺旺。围绕候选人的观点，不同身份的个体可能会产生分歧，但是在热乎乎的香肠面前，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书中提到，“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抗议者和警察从表面上看是对立关系，通过“民主香肠”又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解严之后，当局依然控制电子媒体，把社会运动视为“暴民”的煽动。这时，一个叫做“绿色小组”的民间媒体，扛着摄像机到处流窜，拍摄各种抗议场景，限于拍摄条件，有时镜头晃动，有时还会出现跟着抗议者向前冲或者逃跑的画面。这种“地下媒体”，吸引了大量“地下观众”。作者虽然只有十岁上下，也被这种具有震撼力的视觉镜头吸引，后来到了大学，才知道很多同学小时候都接受过这种纪录片的启蒙教育。近几年，随着网络、手机技术的提高，出现“公民记者”的说法。但是，“绿色小组”的存在，说明公民记者的出现，主要不是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公民意识。正如“绿色小组”的出现，不能单纯归结为摄像机的普及。

近十年台湾好戏连台，按说有很多观点，不知什么原因，作者的回忆有些单调。即使如此，其中几个细节依然过目难忘。媒体从管制走向开放之后，出现激烈的竞争，记者总是冲锋在前。有次台风，记者在水淹及胸的地方现场播报，观众正准备被他的职业道德感动，忽然看到画面后方一个民众骑着脚踏车飘过，原来记者是蹲在水里进行播报。看到这里，我只是觉得有趣得紧，并不认为这种细节说明媒体开放之后会出现乱象，因为在竞争的媒体环境下，这种具有创意的造假行为很容易现出原形。



军队国家化，这是六十年前就反复提及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但是看到作者讲述自己在军队的情形，长官如何三令五申，禁止谈论大选情况，还是有些破天荒的感觉，这对作者可能是一件小事，放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作者还提及他们的驻地离“空军总司令”只有一墙之隔，跟发福中年大叔没有两样的“总司令”，经常晚上一个人穿着白色汗衫短裤骑着小绵羊摩托车出去买珍珠奶茶。我暗暗为“总司令”捏了一把汗，心里涌出“十万个为什么”：他不怕有人刺杀吗？如果有人截

访，怎么办？下雨了没人打伞着凉了，如何是好？摩托车上是否要装个警灯？勤务员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要定个玩忽职守罪，军法处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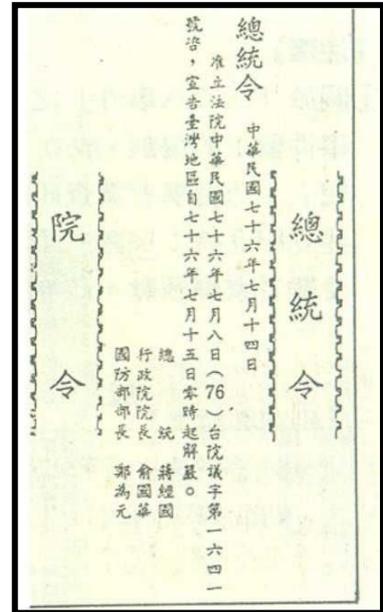
“喝茶”和“被自杀”

美丽岛的美丽，不是从天而降。书中反复提到当年台湾流行的一句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警总是一个神通广大的机构，作者的父亲有一天回到家中，看到有两人坐在家中，他们看到主人回来，非但没有任何惊慌，还把主人带到一个地方“喝茶”，轮流盘问了 24 个小时，因为当时有一起“王幸男邮包爆炸案”，王幸男与作者的父亲在同一家药

厂工作。1981年，31岁的海外学者陈文成回台探亲，因为曾经给党外杂志《美丽岛》捐款被警总约去“喝茶”，次日陈尸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边。当局声称他是“畏罪自杀”，但是书中这样写道：“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陈文成的遭遇，让台湾民众意识到海外留学生中存在“职业学生”，他们大多领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去留学，负有“照顾”其他学生的任务，一旦看见越轨之举，立即层层上报。2009年，财团法人陈文成纪念基金会主办了“我的31岁”接力写作活动，这段“被自杀”的往事再次获得关注。

大规模“喝茶”，会让民众产生恐惧，同时又会消解恐惧，人人喝茶，等于人人不喝茶。当民众“不以喝茶为耻，反以喝茶为荣”，心中的小警总就消失了，茶杯里的风暴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规模“喝茶”是公民意识茁壮成长的先声。在威权体制下，绝大多数民众喜欢老婆/老公孩子热炕头，闲时打打麻将，或者打打酱油，可是，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陆陆续续地“喝茶”，等于接受了一场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公民教育。民众逐渐意识到，公民权利与自己息息相关，并非精英们的独家癖好。民众开始睁开眼睛看台湾，1984年的“江南案”让民众意识到当局和黑社会竟然如此亲密，虽然当局为了改善形象，展开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这并不能阻止民众发明“被江南”的说法。他们不满于台湾三家大同小异的电视台，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不同信息，比如自行安装有线电视，尽管警察会不定期地拆线，民众依然前仆后继地安装。

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陆续展开，最终决定时代的是每个个体的行动。1986年出现“反杜邦案”，杜邦公司准备在罗大佑歌声里的那个鹿港附近设立化工厂，遭到当地民众的抗议，最后设厂计划取消，这在台湾历史上是第一次。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史称“解严”。1988年，开放报禁。1989年，开放党禁。这一年出现“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几万名买不起房子的“无壳蜗牛”，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整个过程非常和谐。1990年出现“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运动”，大学师生是中坚力量，敦促国民党加速政治改革。1991年，台湾当局终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随后，警总废除，高度竞争的媒体、保持行政中立的军队成为现实。台湾并非完美，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的情景，不再可能重现。



公民意识和八卦精神

《我们台湾这些年》不仅讲述了三十年间的政府转型和社会运动，还重点讲述了各种文化事件，充满八卦精神。国民党为了反“靡靡之音”之低俗，推行“净化歌曲”，费玉清、伍思凯最初都曾演唱过这种主旋律歌曲。蒋经国去世，小朋友一把鼻涕一把泪，埋怨民进党气死了“蒋总统”，还会讨论新的“蒋总统”姓不姓蒋，会不会是李“蒋总统”，虽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录影带店的生意却很不错。录影带店通常都有出售成人影片的暗室，由于录影带可以重复读写，经常出现纰漏，动画片里出现少儿不宜的镜头。很多学校都会流传共同的鬼故事，排在第一名的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会在半夜自动起立巡逻。棒球曾被台湾当局赋以民族主义的色彩，棒球队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与美国那种“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截然不同。当年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后来纷纷改名“国家发展研究所”、“中山所”。

公民意识和八卦精神同在，是《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主要特色，它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民主转型不同于暴力革命，不需要翻天覆地，只是春风化雨。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它的大团圆故事，让我读来有一点点感伤。不过，最后依然可以借用陈升的那首歌，“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因为你的美丽，不仅带来我的哀愁，也带来我的希望。

(文中图片依次为李登辉观见蒋经国、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合影与台湾解严令文件)

《我们台湾这些年》 廖信忠 著 重庆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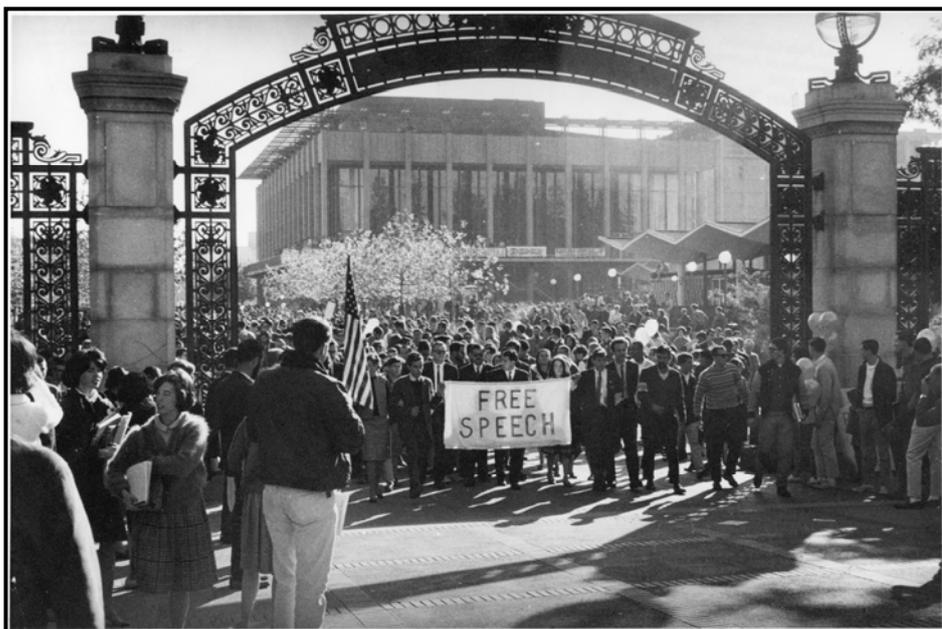
BOOK REVIEW 书评

如何认真面对“政治”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谢尔顿·沃林 (Sheldon S. Wolin) 这个名字, 对于国内政治思想界而言, 恐怕并不大为人所熟知。笔者视野所及, 唯有台湾政治思想史学者钱永祥先生十分看重沃林的思想史研究, 曾以沃林的看法来解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特色, 此外则难见关于沃林的只言片语。说来也不奇怪, 按照美国政治思想的光谱来看, 沃林属于坚定左派阵营, 自然无法与 90 年代国内反激进、反左翼的主流思潮相合拍, 而且在许多人看来, 这位在 1960 年代积极支持伯克利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 (Free-speech movement) 的政治左派, 难免会让国人联想起数十年前的政治运动, 唯恐避之不及, 更谈不上深入理解。在 9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走红的是罗尔斯、哈耶克、柏林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 而另外大行其道、被后现代思潮所推进的文化左派们, 更和沃林这种“要在街上学习政治”的“硬左派”趣味相左, 沃林不为人所重视, 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不过在美国, 沃林却名气甚大, 这位在二战当过轰炸机飞行员的政治理论家, 不仅在 UC 伯克利大学建立起一个紧密的政治学研究圈子, 而且从 1973 年起, 他转入普林斯顿执教, 在那里培养了大批政治理论学者, 如著名女性主义政治学家 Wendy Brown, 阿伦特研究专家 Dana Villa, 以及极富传奇色彩的民权人士 Cornel West (他深受哲学家罗蒂影响, 自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同时他还是一位演员)。除了广育天下英才之外, 他在美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 早在 1960 年代, 他与同僚 John H. Schaar 教授积极参与伯克利的学生运动, 他们在《纽约书评》上发文批评伯克利大学压制学生言论自由, 认为伯克利已经沦落为“知识工厂”, 与“教师”与“学术共同体”的初衷背道而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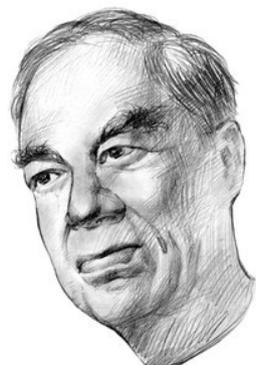
1960 年, 也就是他在伯克利任教时期, 他的成名作《政治与构想: 西方政治思想的延

续和创新》(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出版, 成为几代政治理论学者的重要读物, 在 2004 年, 沃林推出了该书的增补版, 增加了足足 7 章内容, 让人不禁感叹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虽然“壮士暮年”, 仍然“雄心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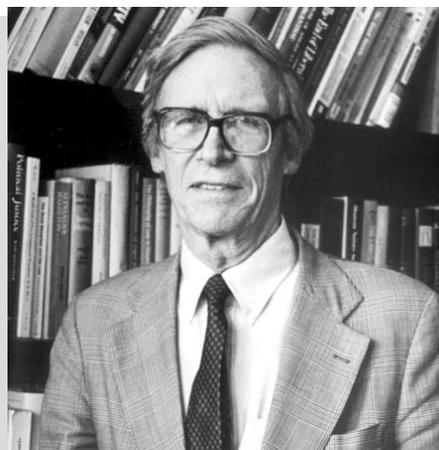
早在增补本出版之前, 沃林就曾在《The Nation》上撰文, 提出他在此书中的一个新看法: 今日美国已经形成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体制。其理由是, 美国借助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变成一个新的“帝国”与“超级力量”, 政治被党派和利益财团所垄断, 公民被矮化, 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 尽管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仍然在歌颂民主, 但是一面却拼命地想让公民安于“私人生活”的日常生活中, 从而将权力集中起来, 形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总体性力量。初听这一判断, 读者或许很容易简单地将沃林视为一个激进、顽固的左翼理论家, 不过要了解这一判断的思想根源, 我们或许还是需要回到他的这本皇皇巨著。

将政治哲学以历史化的方式来考察, 这并不少见, 比如 1937 年出版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 以及列奥·斯特劳所主编的《政治哲学史》, 都算个中出类拔萃之作, 而另一位立志重写政治思想史的沃格林, 因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萨拜因《政

治学说史》的理论缺陷，放弃了未完成的《政治观念史稿》，转而写成了五卷本的《秩序与历史》。比较来看，萨拜因认为人类政治活动是一种理性的、有意识的行为，斯特劳斯则会认为，政治哲学追问的是“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那么这必然牵涉到关于政治的真理问题，沃格林会认为，政治秩序是与人的心灵秩序紧密相关，人的存在意义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一旦心灵失序，政治也会变成无序的状态。



理查德·罗蒂 绘画/田俊



不过沃林的预设却与以上各位存在差异，他认为，“政治”首先是一种在个人、团体中间寻找竞争优势的活动，那么这肯定是一种冲突性的活动；其次，“政治”发生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政治的互相冲突、竞争的行为会影响到全社会。正是在这一假设下，沃林的“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力量”在“空间”中的活动，他认为柏拉图，奥古斯丁这些思想家，只不过是“在用哲学与宗教去审查政治，那并非是“政治”的本质所在，政治的本质是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冲突性，当柏拉图试图用永恒善的哲学目标去要求政治秩序时，矛盾便出现了，因为政治的杂乱与冲突是无法消除的，而柏拉图哲学所要求的和谐、圆满的理念世界则是反政治的。而罗马帝国以利益政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短暂而辉煌的共和制岁月之后，政治便开始腐化堕落，派系之争越演越烈，公民再也无法参与到政治当中，导致了这样一个新的政治观念的产生，那就是试图想让政治得到宗教性的拯救，因此奥古斯都被当成承载着神圣宗教意义的元首，这也意味着“政治”的本质最终被“道德”所压抑，这同样是一条反政治的路径。

粗略看来，对于沃林而言，“政治”一事，只不过是力量间的互相搏斗，目标是想获得支配权。各位或许已经发觉，这一看法与韦伯如出一辙，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明确地写道：“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无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以权力支配作为政治性格的主要特征，虽是由韦伯发展壮大，但对于沃林而言，使得“政治”能突破中世纪政教体制的漫漫长夜，而能最终浮出水面，要归功于那位被污名化为“权术家”的马基雅维利，正是他，摆脱了政治形而上学的困扰，转而以一种面对真实世界的态度去看待“政治”，而这也直接导致了霍布斯依靠人类自己来创造政治的伟大构想，他以残酷无比的“自然状态”作为人类政治的起点，为他的“利维坦”铺平了道路。

而自由主义崛起的本质，在沃林看来，其实来源于“社会”在近代历史的兴起，而自由主义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洛克的传统，洛克认为，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活动的实体，强调的是个人在劳动分工制度下的经济行为，这种由个人经济活动的选择产生的社会秩序，让洛克及后世的经济学家们都幻想认为，自发生长的市场社会秩序可以取代“暴力支配”的政治秩序，或者认为政府的权力只能维持为最低限度，也就是后世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守夜人”角色。这种以社会秩序取代政治秩序的观念，是当代自由主义最为基本的特征。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沃林开启了一条批判当代自由主义的左派思路。他认为自由与民主的是内在冲突的，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权利的获得，但是却不会去调整结果的不平等，拥有财富的群体会获得更大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主则强调的是政治参与的价值，也就是要用民主决策的方式去纠正这种不平等，更关键的是，不能让利益势力的高低起落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否则，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以法律规则保护有权者、压抑弱势群体。

面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有代表性的罗尔斯，沃林在书中的批评言论更是不遗余力，他认为罗尔斯尽管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却仍然延续自由主义重经济结构的思路，试图发展出一套以法学、经济学为主的

公共哲学，这就使得这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成为一个纯粹“管理学”意义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对于沃林而言，政治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对不平等的反抗。

在当代政治思潮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非沃林一家独有，列奥·斯特劳斯与卡尔·施米特算是自由主义的两位头号敌人，就连汉娜·阿伦特这位共和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也有相当多的批评。不过有趣的是，要仔细分辨沃林与这些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却并非一件易事，事实上，沃林对于列奥·斯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阿伦特的精英共和主义都有相当多的批评，这使得我们会更迷惑，沃林对于民主的看法，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到底具有哪些特别的思想特质？



初看起来，沃林与阿伦特、施米特最为相像，他们都共同强调“政治领域”的独特价值，反对经济、宗教对这个独特的政治领域的侵蚀。甚至有不少美国政治学者都认为，沃林对待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看法至少在形式上，和施米特如出一辙，都是将民主精神与宪政制度一分为二，认为自由议会制与真正的民主之间互不相容。不过施米特与沃林的最后落脚点却是迥异有别，前者经营的是一套“人民主权”的国家理论，以政治的“决断性”来捍卫国家的安全，而沃林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持续释放能量，从而遏制国家的集权冲动，尽管施米特与沃林都对现代总体国家不满，但是前者是彻底精英主义式的，关注的是最高主权执行者，而沃林的着眼点却在于公民。那么，是否阿伦特与沃林更为接近呢？答案也并不尽然，沃林在《汉娜·阿伦特：民主与政治性》里批评道，阿伦特以古希腊的政治参与作为蓝本，将政治看作是闲暇阶层实现其存在意义和人生荣耀的事业，但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却同时肩负劳动与政治参与两种角色，但是阿伦特却对大众社会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她受尼采的英雄主义与托克维尔对大众民主的担忧所影响，最终发展出来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公民理论，这是沃林所不能认同的。

对于斯特劳斯的精英主义，沃林也是嗤之以鼻。1963年，时任《美国政治学评论》编辑的曼斯菲尔德向沃林及其同事 John Scharr 约稿，就 Herbert J. Storing 所著的《关于政治的科学研究论文》撰写书评，尽管沃林与斯特劳斯一样，都反对当时弥漫在美国政治科学界的实证主义，但是沃林却敏锐地嗅到斯特劳斯、Storing 文章中的反民主气味，于是大加挞伐，开启了与斯特劳斯的一场论战。时隔多年，老曼斯菲尔德的儿子曼斯菲尔德.Jr.还在其《驯服君主》一书的序言里批评沃林，认为他因为德性的精英性格而与实证主义科学家们同流合污，为其助阵。

尽管沃林是相当激进的民主左派，但是他又与美国学院的文化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信奉者）又有很大差异，他并不认为文化左派就能解决后现代政治情境下的政治反抗问题，相反他强调的还是“硬政治”的参与。在沃林2008年出版的新书《公司化的民主：管理下的民主与颠倒极权主义幽灵》一书中，他如此展望民主的前景：民主应该是一种顺应各种环境而变化的“短暂性的民主”，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民主的目标不是他物，而是今日国家的“超级力量”，民主参与要以瓦解现代国家的总体性力量为前提。这也最终标识出沃林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即对任何一种总体性权力的警惕与提防，而且要重新恢复“政治”的反抗性格，要让积极的政治参与成为后现代生活中的日常内容。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现状，其实也可用沃林的看法来进行比照，当政府通过大型公司、财团获得足够的资源，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力量时，社会反而被压缩成一个原子化、政治冷感的私人领域，虽然人们可以夜夜笙歌，但是却埋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文中图片为1960年代加州大学学生争取言论自由的政治运动场景）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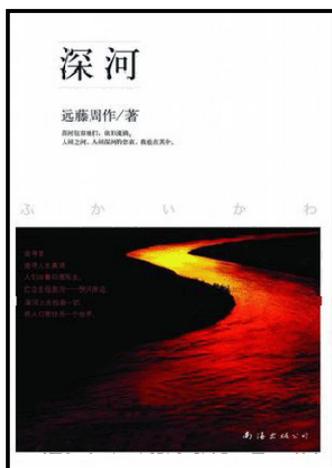
by Sheldon S. Wol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panded edition (May 3, 2004)

BOOK REVIEW 书评

可以向神要一个苦难的原因吗？

撰稿人 朱白（广州 zhubai@tom.com）



什么叫经典小说呢？在此前看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时我在想，这种技术完美、意识独特的作品还不能足以称之为经典，我理解的经典作品应该是那种不需要评论家过多阐释或导语，也不需要文学史或者艺术史来先读者一步作出判定，更不需要所谓专家或者专业人士对之作出理性而学术的判断，就可以被任意的、随意的某个普通读者拿起来放不下并读后深深被打动的小说作品，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经典。比如《百年孤独》、《麦田守望者》、《包法利夫人》、《红楼梦》。

如果这个理解稍稍有一点道理的话，沿着这个思路来判断，我觉得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深河》正是应该成为这一类经典作品的小说。从写作方式来说，远藤周作在年迈之际（也就是经历了人生峰谷和洞悉了过多小说技术之后），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朴实无华让读者毫无障碍式的写作。实际上这可以看做一种对文字的尊重，这种尊重并不是笨拙，也不是放弃追求或者迎合读者，而是一种配得上内容和叙述精神的恰当形式。这样直接朴实的语言，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诗意”的语言，相比而言，前者应该是那种作者与读者地位平等下的交流，也是去除花哨之后的一种“实打实”的本质再现，而后者更像是印象派随意而潇洒地在画布上涂上各种鲜艳的色彩，通俗地说，就是涂抹色彩的时候作者自己是爽到了，但是他很难带领他的读者一起爽。往前想一下，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过先锋派写作，臆想伴随着大块大块的色彩，被涂抹在一本本厚重的小说中，时过今日，还有多少个细节或者那些被作家自己和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色彩留存在读者心中呢？

当然，现在再来说当初的某种写作存在的瑕疵，是一种不厚道的行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远藤周作这种有实质的朴实写作，它有多么多么的好。这部远藤周作 73 岁时完成的作品《深河》，被誉为“20 世纪日本文学高峰”之作，在我看来，这样的作品应该也是整个人类的高峰作品，因为它所蕴含的情绪直接可以打动它的读者，这种直接从作者体内产生的巨大悲悯，既是对天地的悲悯，也是对作家自己以及每一个读者的悲悯。《深河》里的几个主人公几乎不分主次，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的生命遭遇到不同的困惑，为了解答和解脱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到宗教圣地的印度旅行，这也可以理解成寻找生命真谛的一次旅行。书的腰封处写着“一部叩问生命真谛的杰作”，跟大量自以为畅销的烂书比起来，这样的腰封宣传语比较靠谱，生命的真谛，在哪里呢，大概不同的人会寻找到不同的答案。我以为，任何真诚的寻找都会找到跟自己有缘分的那个答案。

当然，现在再来说当初的某种写作存在的瑕疵，是一种不厚道的行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远藤周作这种有实质的朴实写作，它有多么多么的好。这部远藤周作 73 岁时完成的作品《深河》，被誉为“20 世纪日本文学高峰”之作，在我看来，这样的作品应该也是整个人类的高峰作品，因为它所蕴含的情绪直接可以打动它的读者，这种直接从作者体内产生的巨大悲悯，既是对天地的悲悯，也是对作家自己以及每一个读者的悲悯。《深河》里的几个主人公几乎不分主次，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的生命遭遇到不同的困惑，为了解答和解脱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到宗教圣地的印度旅行，这也可以理解成寻找生命真谛的一次旅行。书的腰封处写着“一部叩问生命真谛的杰作”，跟大量自以为畅销的烂书比起来，这样的腰封宣传语比较靠谱，生命的真谛，在哪里呢，大概不同的人会寻找到不同的答案。我以为，任何真诚的寻找都会找到跟自己有缘分的那个答案。

在小说里，作家分别描写了几个遇到不同困惑的人，他们均是普通如你我一样的庸常之人：年轻放荡中年离婚后不知人生目的的少妇，追寻妻子遗愿渴望其转世的老年男人，总是把心灵遭遇寄托在笼中小鸟的童话作家，缅甸丛林吃过人肉的日本老兵，还有一个一直被宗教排斥同时也无比忠诚于上帝的神甫（神甫“大津”艰难地背着异教徒走向象征着印度教徒圣地的恒河，堪称书中最富宗教震撼力量的一副画面），他们经历生死或者心灵压抑许久之后，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宗教圣地相遇了。在印度那浩大而深邃的恒河面前，各人的解脱和对人生的理解得到洗涤。人类的困惑和遭遇，以及对宗教的皈依感，都在远藤周作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中得以展示了。我还想说的是，远藤周作的这种“实打实”的现实主义写法，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却具有了一种深沉和厚重的力量，那种因为坦诚而对生命呈现出来的一种美感，实在是永远都不会过时。

《深河》有着并列的几条线索，他们表面上关联不大，甚至可以调整部长篇拆分成几篇短篇小说来看，但是书中的几

个人物穿插着有着一面之交似的的关联，他们在精神上有着难以被其他人接近的共鸣，我将之看做是一部有机长篇小说。当然，远藤周作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上所消耗的心思还是能看出来的，比如开头的妻子之死和结尾处神甫之死，成了全篇中精彩呼应的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当然可以想当然——我觉得如果将《深河》拍成一部电影，应该会是一部迷人的作品，就像《秋刀鱼的滋味》、《阿甘正传》、《甜蜜的生活》、《教父》那样的不需要多说、无论哪种体系下的审美都没问题的作品。内容上，《深河》饱含着作者巨大而真诚的悲天悯人情怀，用毫不造作感的遭遇式故事将几段看似没什么联系但却正是生活本真面貌的人物链接起来，他们用普通百姓式的情感故事在发出一种追寻和质问，没有一种比如此温柔质问天地神灵的方式更能接近人类所不能认识的“神”的了，不是对宗教的皈依，而是对神的最终归属。在形式上，远藤周作用几个完全可以单独成篇的故事，巧妙链接在一起，共同完成对主题的极端深化。这种结构上的浪漫主义应该是那种天然产品，我觉得，这种形式的美感也正是靠想像力完成的艺术之美存在的证据之一。内容和形式，看上去都非常适合拍成一部电影。如果说文字已经沦为一种落后形式的话，取而代之的影像、声音以及可以更形象化、感知化的多媒体艺术，那么可以想像的是，从文字变成图像之后，《深河》会不再缺少观众，它完全可以再次唤醒人们对艺术感染力的惊叹和震撼。《深河》，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7月版，定价25.00元

BOOK REVIEW 书评

中日东亚共同体的前世今生

特约撰稿人 刘 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日本民主党上台伊始，就以相当醒目的“亚洲复归”的姿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侧目，而鸠山首相关于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则是其最强音。但鸠山首相在若干国际场合(G20、东亚三国峰会等)对该构想的一再阐释，并未如日方所期待的那样，获得中、韩两国的高调响应。如此“温差”的背后，既有民主党政权及鸠山本人对该构想的阐述尚停留在比较泛化的“务虚”层面，对其作为法理概念的内涵、外延缺乏展开，尤其是具体化的操作“路线图”付诸阙如，令亚洲相关国家对其必要性与紧迫性的理解大打折扣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并承认，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性基础未必如日方所想像的那样坚固，坚固到足以维系像欧盟(EU)那样的、可谈论在政治上让渡主权的跨国联盟的程度。

当然，前一个原因是直接的、主要的，但也是表层的，而后者则是隐性的、深层的，但却是现实的，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且就其重要性而言，决非次要。以今天中日关系乍暖还寒的微妙，不用说两国主流媒体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律”：尽量不把深藏于历史地表下的想法、感觉“表面化”，与当下的现实政治、国际关系混为一谈。说白了，就是谁都不愿戳破窗纸，某种对过去历史的既成看法被各自小心翼翼地藏起，不争论不等于是有共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家都明白争也无益，徒伤和气，不利和谐。可话说回来，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类似“窗纸心理”的集体无意识，会不时浮出水面，偶露峥嵘。这种心理沉淀及其“表面化”，才是妨碍两国合作升级的深层阻力。譬如，举例来说，当日本首相在北京的东亚三国峰会上激情端出“鸠山版”共同体构想的时候，却在多少中国人的内心勾起了对诸如“亚洲一体论”、“大亚洲主义”及“大东亚共荣圈”等百年历史的杂乱联想。这里既有日本近代以来代代相袭的东亚战略和大陆政策的政治基因，也掺杂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不止一代中国精英分子对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以降，如过江之鲫般层出不穷的东洋战略家、革命志士和大陆浪人的善意而天真的误读、想像。

毋庸讳言，从根子上说，古代日本由于地理上“偏安”于日本海以东的海上一隅，虽然与大陆相比是后发文明，但从未被置身于天朝的册封纳贡体系之内，学习归学习，客观上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编外”的身份及文化独立性。所以，公元607年，受圣德太子派遣使隋的小野妹子，向隋帝递交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实未必是



“挑战”，很大程度上是日人为谋求对等的外交地位的真诚表达。虽然惹得隋炀帝龙颜大不悦，拒绝了日人的请求，但小野在第二次使隋时，仍然递交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这种对自主意识的近乎偏执的表达，其实颇符合日人的文化性格。

日本当代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上古时代神话传说的集大成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充满了对天照大神等各路神祇的描绘，揉“皇统”于“神统”之中。近世思想家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将神国观演绎到了极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世中万物皆变，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可以说，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神国观，构成了日本“民族性自恃”的文化基础，乃至到江户时代，更衍生出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观：基于中华传统“华夷之辨”思想的华夷秩序被掉了个过，日本为文化核心的“华”，中国反为受其文化辐射的化外之“夷”了。这种认知错位可以说酿成了近代以降中日两国绵绵长恨的文化由头。

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

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国际上历来有种颇具“酷评”色彩的日本论，所谓日本“长于战术，短于战略”。此判断正确与否，暂不置评，但日本近代以来，确产生过众多的战略家（或曰政略家）及形形色色的国家战略：从山县有朋主张的“主权线”与“利益线”说，到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从“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谓代有政略，与时俱进，不一而足。其共通的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张：从“保全中国论”到“亚洲门罗主义”，从“满蒙领有论”到“对华全面战争论”，从“最终战争论”到“南进政策”，日本的“战略”一个比一个更激进，但眼瞅着近代化以来靠扩张起家的“国富”一点一点拼光，最终陷入与英美为敌的绝路，从而导致决定性的、致命的战略失败。而那些如战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前首相石桥湛三所主张的基于“小日本主义”的“满蒙放弃论”等真正富于历史洞见的战略思想，则被淹没于狂热的国家主义潮流中以至无形了。

倒是战后，在美国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和历史反省的基础上，日本的官、产、学精英真正号准了国家的命脉，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国家战略，才使日本走上了和平繁荣的轨道。这种举世公认的成就，恐怕是战前那些崇尚“阴谋论”的战略家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一方面由于惨痛历史的过于浓重的阴影，另一方面由于冷战体制及战后日本社会的保守思潮，当战后60多年的今天，中国人复闻诸如“东亚共同体”等与历史上某些带有负面色彩的政治观念相近的表达时，所表现出的某种近乎本能的、反应性联想“症状”，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但惟其是悲剧，才不能让伤痛和悲情长久缠绕，总要想办法超越才是，否则便意味着更大的悲剧。同时应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已然是一个经济崛起、至少在总量上与东邻相伯仲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浮出水面的“东亚共同体”动议，与其说是历史的延伸，毋宁说是出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状况下，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现实需要。

整整85年前，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对已站在“霸道”与“王道”的十字路口的日本发出了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的呼吁，以期利用彼时在日本甚嚣尘上的“大亚洲主义”思潮，旧瓶新酒，置换为“孙文版”联日抗衡西方列强的亚洲观。7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日本友人也曾有过中日关系要“共存共荣”的表述。诸如此类的政治表达，其实与今天的“东亚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等概念一样，除了契合彼时特殊政治需要的语境成分外，无非是一种对中日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谋求战略双赢的善意期许。对此，日方理应理解国人的“敏感”；而国人也应该自信地超越历史，拥抱未来。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史桂芳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版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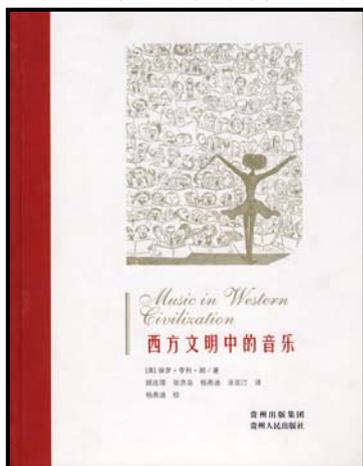
用一生来读历史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 (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没想到这本书这么好。

我自以为是个有点资历的音乐爱好者，音乐史中的正史野史读过一些，算是挑剔的读者，但这次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地把这本一千多页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从头到尾读、有目的地翻开自己喜欢的音乐家或者随机乱翻，往往深为折服。像任何历史一样，音乐的故事吸收了这个世界上的功名富贵、声色犬马和冷寂人生之后的哀荣。CD上，名字仅仅是名字，和音乐有着神秘的联系，而在历史中，它们背后都有各自的血肉和复杂。

书的体例并不新鲜，从古希腊、拜占庭、罗马一路说到巴洛克、古典时期、浪漫派直到20世纪初，除了音乐、历史、文化，还总结了目前的音乐史、音乐学研究，直到对现代生活的工业化、去个性化的忧虑。对中国人而言，从古典到浪漫派（大体上说是海顿到马勒）是最亲切的一段，这个时段内作品的演出至今仍是活跃的主流。而古典之前，精确地说是从



古希腊到巴赫，往往因传统的悬隔、宗教意味的浓重而不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事实上，在如今仍然属于主流的海顿、莫扎特甚至贝多芬的音乐中，我们仍能看到早期音乐的影子和它们为后人准备的土壤，更不用说巴赫。我大胆向国内读者特别推荐本书从拜占庭到文艺复兴这一大段，因为这恐怕也是中文音乐史料中比较欠缺的部分，也因为疏离当代读者的生活经验，离开文本援助就难于理解。

这一段历史中，教堂、礼拜音乐是主体。本书细细展开格利高里圣咏传统之后的帕勒斯特里纳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1525--1594)、加布里埃利 (Giovanni Gabrieli, 1554--1612) 直至威尼斯这个天主教艺术中心 (16世纪)，加布里埃利的多声部合唱，“稀少的管弦乐伴奏，光辉的独唱，尖锐的动态对比已经将音乐领入了充满戏剧性的不朽的巴洛克世界。”和所有成体系的历史一样，作者难免在某些前提下预设和“组织”历史，或者过度期待历史中的线索和原因而引导着读者，但本书的巨大篇幅在某种程度上为“组织化”叙述消了毒——细节有时淹没了线索，甚至让线索互相矛盾，而这正是世界的一种真实。比如提到十五世纪著名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死后的财产清单包括几百件乐器，而这正是英国器乐繁荣的时期；而今天在我们听来同样天使般纯净的合唱，拉索斯 (Orlande de Lassus, 1532--1594) 和帕勒斯特里纳，细看之下其发展的路数并不相同：前者总结并代表文艺复兴各种音乐形式的高端，而后者则完全钻进圣乐，以既光彩、完美又过于保守的姿态，成为反潮流的“反宗教改革音乐家”。这些淹没在教堂生活里，跟教义相联系的音乐家，在古典、浪漫时期那些多姿多彩的世俗生命中不复存在。如今如果你在欧美国家演奏古乐器或参加合唱，还经常会遇到这些名字。

不管是跟随作者清理出的线索，还是从零星唱片、细节叙述中寻求瞬间感动，这一段历史中的音乐都是富厚的财产。就“信仰”这个貌似单调的心理意念来讲，它催生出来的细致意象，实在令人惊叹。一方面信仰是看轻智慧的，另一方面它又调动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热情，贡献给智慧的成品。这一段历史，当然要和倾听和阅读一起来做才有圆满的意义，但作者对教堂音乐叙述本身对人启发很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诗歌、舞蹈和音乐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体例明显地影响了音乐的形式，而舞蹈则一直在“图解”音乐，体现音乐最感官的部分，也给许多音乐语汇提供了“情景联想”的资本。直到后来的贝多芬时代，舞蹈音乐才慢慢和所谓“严肃音乐”明显地区分开。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分分合合，有神学、美学风气的影响，也有因为个别人物带来的偶然性——这一点，在别的历史中也很常见。本书并不仅仅讲音乐，而将音乐放在“文明中”，这正是它的特别之处。历史总是如此，抓一把沙子，往往各色都有，不可能完全分清。而音乐这种听觉艺术，虽然难免给人超时代、超文本的错觉，其实它社会化的程度并不低。

至于从巴赫以降到浪漫派这一段音乐，我在这里不用多说。经常听音乐的朋友，可以尽情在这五百多页的范围内对照自己的听感。而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代 (1940年前)，莫扎特和巴赫的地位并不如今，但此书对这几位巨人的评价，基本和我们如今的认知并无二致，甚至也许可以这样猜测，这本书产生的影响，正是形成我们今天的评价的力量之一：对莫

扎特作品中的“洛可可性”和“歌剧性”，作者更强调后者，甚至指出了莫扎特内在的复杂性、悲剧性以及它的自成体系，这都是非常“现代”的视角。而洛可可可在我们的时代也确实不那么时兴了。而对海顿和莫扎特的关系，作者认为海顿曾经提供给莫扎特在“形式”、“逻辑”上的帮助。笔者个人以为对海顿和莫扎特并不好下一个比较结论，因为莫扎特在很多作品中都显得比海顿更传统，更“细”和“圆”，而海顿在清晰的交响曲和室内乐之外，也在键盘作品中体现了奇崛、粗糙的元素。当然，这是今人积累了当下的倾听经验后的感想。审美经验以及对它们的描述在历史中的流变是阅读历史的另一个观察点。

本书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文笔之好，甚至可以说是很难被超越的。有书评说，仅仅从文字的角度，这本书“能教人怎么写好散文”。在我看来，作者的热情贯注到几乎所有细节，好比血流到肢体末端仍然传送着热力。作者充满活力和温暖的诗意表达无处不在。比如说到巴赫，“不论我们以什么视角来接近巴赫，都会遇到巨大的障碍。音乐爱好者进入他的作品的宏伟宫殿，对那样的设计和规划只能拜倒，然后彻底迷失——因为你在赞美那严整建筑的几何奇迹时，又会发现整个人被一种温柔的诗意侵入，这样的诗意来自巍峨构造之中那些精细的装饰音。但如果你把注意力转向这诗意的源头，你又会看到，建筑的围墙立柱体现的逻辑和秩序无处不在。批评家在这无尽的资源面前变得谦卑，但他同样被这绝对数学之美和绝对诗意之美的统一所迷惑。当他尝试一小节一小节地分析音乐，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开始分析每行音乐中的象征意义。”

作者这样感性的描述并不仅仅来自“印象”，每一句话都有清晰的所指。而斯必塔、史怀哲等各个时期的巴赫专家都曾这些“感受”写下了“见证”。

作者保罗·亨利·朗，出生于1901年的匈牙利，拿过文学学位，博士论文则是关于法国文学和语言学（有趣的是，竟然作为巴黎大学队员参加过1924年奥运会的划船项目），重点在法国歌剧。1929年移居美国，三十出头就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出版此书时他40岁，大概学养和激情都旺盛——从此书文笔就能猜到——其实他的其他几本著作，也在我将读之列。无论花费巨大篇幅谈论的巴赫还是从主流作品中淡出的无数早期作品，作者都清清楚楚地交代出特点，并且和同代人、同类而异时的音乐家作出甄别，而不是像许多平庸作者那样，将一段描述置于语焉不详的当口即扬长而去。这不仅是因为本书是一部需要负责的“通史”，还源于作者旺盛的才能和敏锐的辨别力。评论家、史学家常常给人“书橱”的先入之见，但对一类事物能够体察到这种广度和深度，又处处能抓到抽象的本质，哪里是仅仅机械积累所能为。关于本书，笔者正好遇到一则轶事：另一位有影响的音乐学家罗森（Charles Rosen）曾提到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是由作者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助手代为，朗的遗孀在2006年致文纽约时报辟谣，说亲见保罗在1934年后逐字用英文写成此书，而他于1929年来美之时，几乎不通英语。罗森回复致歉，“我很高兴这个流传于五十年前的传闻是谣言。”

其实历史是读不完的，读到某处你就不得不停下来深入，以至于永远读不完。完整地经历一种所谓通史，恐怕得有上帝的视角。笔者听过大量有名无名的音乐，深知音乐史并不可信。话语权的取得，毕竟有太大偶然性，尤其对音乐而言，要获得演奏机会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机会，如果不能得到机会，就可能永远得不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流行”和“试图挖掘”的东西，然后经历新一轮的“扬弃”。但至少对古典音乐而言，历史感的辅佐和激励，对“听”本身是个强大、有效的推动。听和读之间的抵抗和质问，都是认知中的乐趣。尽管我们终将被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所欺骗（就像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感知），但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都值得人努力地寻求，音乐史则告诉我们不管一生有多长，总有听不完的好音乐。世上有过这么多的人生，这么多种的光彩和悲喜——和它们的沟通，是今天的安慰。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美] 保罗·亨利·朗著，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BOOK REVIEW 书评

革命、精英与社会思想

特约撰稿人 羽良（北京 priestliu@gmail.com）

“你猜猜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 22 岁时在做什么？”如果拿这样一个问题去问任何一个国内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得到的回答十之八九是“苦读，准备留学美国”之类的回答。这种回答符合中国学生对著名经济学家青年时代人生规划的理想。苦读，留学，跟着一个名震寰宇的导师，写一篇足以成名立万的博士论文，然后，获得一份名校的教职 offer。剩下的工作，就是在一流学刊发几篇论文，拿到终身教职，被后来者膜拜，最终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那么，1960 年，青木昌彦 22 岁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答案是在东京秋叶原万世桥警察署的拘留室。身为东京大学青年精英的青木身陷囹圄，当然不是



因为一般的小偷小摸，但其被捕的罪名在今天的人看来，怕是也大的吓人：在羽田机场搭建路障，试图阻挠首相岸信介出访美国签署《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青木昌彦参与其中的身份不是心血来潮的“围观群众”，而是作为当时著名左翼学生运动组织“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 BUND）的创始人和规模庞大、组织松散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即“全学联”）情报宣传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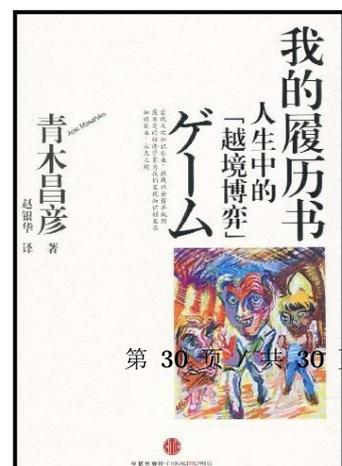
当然，并不是说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在青年时代投身政治性极强的社会运动是一件多么荣耀或者多应该效仿的事情。按照青木昌彦自己的看法，在日本战后初期那个“政治的季节”，作为东大青年精英投身反对安保条约，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借美国庇护复活这类学生运动，是那个大时代中的必然。但是，若以中国人惯常的“主流”论调看来，今天在经济学界可谓誉满全球的青木昌彦，从激烈叛逆主流社会的革命青年到主流经济学的社会精英，贯穿其中的思想历程却可能相当的令人费解。

熟悉日本现代史的人都清楚，围绕着《安保条约》的政治斗争，是日本战后十余年最重要的公共政治事件。其直接结果，便是奠定了日本战后政治高度平民化的基础，即便与之伴生了所谓“1955 年体制”（自民党一党独大和体制化的派阀政治），但反安保运动仍成功阻止了战后日本政府的威权化倾向，迫使岸信介政府放弃了警察扩权等一系列有碍社会民主的警察国家政策。此后的自民党政府，也不得将政治赎买政策制度化利益分配体制，总体上令经济发展惠及绝大多数国民。更有趣的是，反安保运动，如同战后欧美国家历次重大的社会运动一样，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预演和催化剂，反安保运动所孕育的一大批革命青年，在历经对主流社会价值的反叛→参与社会运动→斗争受挫→自我反思这一系列思想过程之后，大多数最终重新回归主流社会。但这种回归，不是被过去的旧体制所售卖，而是在窥视和体验到被运动所改变的社会之后，主动的回归，为业已反省过的思想和观念重新寻找社会认同，以新的主流社会精英的面貌，或积极投身相对温和的社会改造，或为下一次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和道德资源。青木昌彦在其自传（《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中所披露的他自己六次“知识创业”的个人史，正是日本反安保一代的典型写照。

在我看来，青木昌彦的自传带出了两个颇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分子问题：一是一个社会该如何对待叛逆它的精英；二是知识分子如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思想历史。

在市民社会日趋发达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源于对纳粹轴心国所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的激烈批判，也出于对父辈中产阶级保守主义的厌恶与反抗，战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中产阶级后代的集体反叛，其标志便是以中产家庭子弟为先锋，伴随着市民无产阶级支持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与中国人所惯常想象的精英再生产方式不同，发达国家战后社会精英的再生产，始终是以前述所讲的“青年反叛主流社会→卷入社会运动→回归主流社会”这样一个模式进行着社会精英的再生产，青木昌彦在其自传“霞关任职”一章有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



述堪为上述过程的一个经典的注脚：“1997年7月的一天，在我的新办公室——位于东京霞关通商产业省总部二楼一隅的房间里，我与渡边修事务次官共进午餐。我刚刚接替小宫隆太郎教授就任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此时此刻，我忍不住对他说：‘真的就是从这窗子下面开始的！’……就是在这里，1959年11月，肩上斜挂着布带的社会党组织局局长江田三郎高喊了一声‘去国会’，然后率领着游行队伍出发了……游行队伍真的冲进了国会院内。”与之对照，德国68一代中，后来成为德国外交部长的绿党领袖人物菲舍尔，也经历了和青木昌彦相似的回归主流社会的过程。后者的回归程度似乎更为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讲，Charles Tilly 和 Sidney Tarrow 等社会运动学者将战后西方民主社会命名为“社会运动社会”可谓意味深远。因为，这样一个社会，通过貌似反体制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再生产了一代又一代新的社会精英，而社会最终也能够以开放和变革的姿态，重新将当年反体制的精英吸纳。社会在反复的社会运动中自我变革、创新，同时，也维持着日趋复杂化的再生产过程。

相对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香门第”、“世家子弟”这种带有浓重前现代色彩的精英生产方式，其实早已被激烈的意识形态革命所打碎。然而，革命过后，新社会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精英在生产关系。大规模的社会统合首先根绝了传统意义上知识精英的生存土壤，而以文革为代表的前后历次政治斗争，又在不断的清洗和打断体制内精英的再生产。即便那些侥幸在残酷的运动和互斗中幸存下来的精英人群，也始终难以被后来的体制所完全接纳，除非以思想妥协、被收买吸纳和自我出卖的形式回归，否则只能继续在社会中自我边缘化或者干脆出走逃离。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人才流失海外”、“大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甚或“大学教授变叫兽”之类的精英德智蜕化现象，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社会的威权特性，破坏了社会精英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对反叛的精英也几乎不再开放。即便是90年代大规模的精英下海，今天也开始变调为难寻法治原则的“原罪清算”和“富人后代移民”。

当然，在威权自我强化、巩固的过程中，吸纳政策也曾经甚至可能还在继续发挥着收买曾经“反叛”的精英的作用。但这种吸纳，与青木昌彦这些人所经历的主动回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如其自己所叙述的一样，既不是背叛自己思想的过去，也不是对一个不肯变革的铁腕威权抱以不切实际的改良幻想，而是要“跨越‘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虚拟枪毙’，……从学者立场出发参与其变化进程的机会”。这种参与与回归的根本前提，是日本政治持续深入的民主化和政府良治理念的不断贯彻。无论是作为前提的社会大环境，还是建立在个人思想自省基础上重新选择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被吸纳者”其实都不具备。有太多人选择与过去的抗争思想决绝，有太多人选择以告别革命的方式为自己被收买提供口实。既少有人勇于拒绝威权提供的利益诱惑，也极少看到有人对自己早年“反叛主流”的思想做出诚实的交待和解释。

如此，似乎也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青木昌彦在感到自己以学者身份参与体制变化的初衷难以达成后，毅然离开自己的“体制智库创业”，而无数中国的经济学者，却越发学而优则仕，唱出与自己当年鼓吹理论南辕北辙的新腔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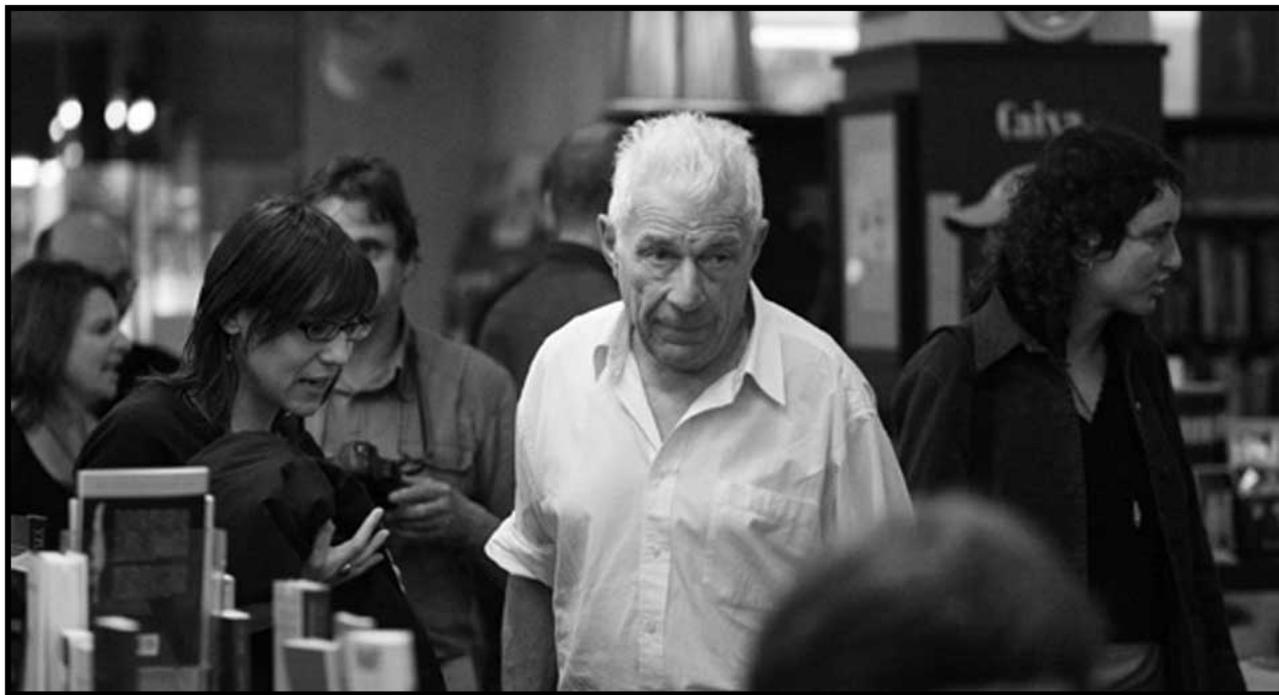
(图为某次学术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正在发言，吴右手白发者为青木昌彦)

《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 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BOOK REVIEW 书评

约翰·伯格：有故事的人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约定》、《讲故事的人》、《我们在此相遇》，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三部作品，刚好为我们构成了一个叙述场景：读者与故事讲述者像是一对情人，事先约定好了见面地点，尔后双方如期相遇，正式开始了约会——虽然这是一个迟到的约会。按理说，两个月之前这三本书都应该相继面世，付梓之际唯独欠缺梁文道先生的一篇总序，而梁先生又极重视约翰·伯格这位“西方左翼思想的传人”，故而对于这篇序言反复斟酌，不肯轻易下笔。

梁先生在序言里特别提到了约翰·伯格身上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传统。他认为，在经历过冷战、苏东剧变这“两次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打击”后，能够存活下来并持续发挥影响力的欧洲知识分子，伯格算得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一手投入公共领域的锋锐评论，另一手则是深沉内向的虚构创作”是这位“讲故事的人”多年来的最佳写照。

约翰·伯格的“故事”到底讲得好不好，先存而不论。但是，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约翰·伯格自己的故事，则要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讲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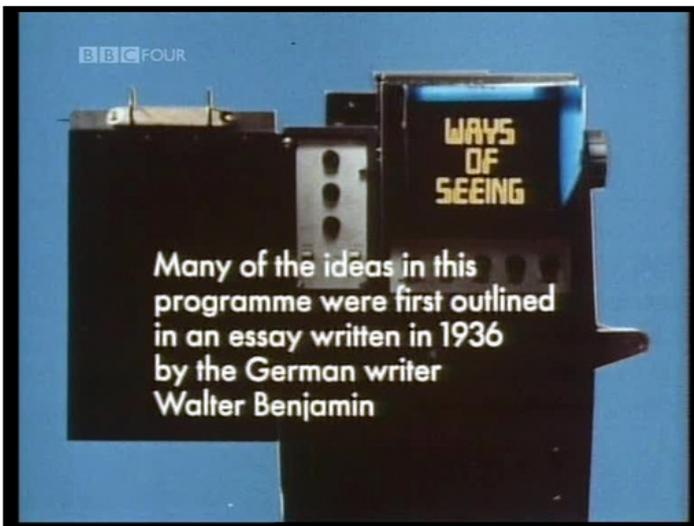
那时，战后复原的伯格已经完成了在切尔西艺术学院（Chelsea School of Art）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Central School of Art）的学习，开始以画家的身份进入公众的视野，在伦敦的多个画廊举办展览。有 7 年时间，他还兼任着绘画教师的职位，开始为英国著名的时政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撰写艺术批评。但伯格却一写而不可收，所论及的话题也逐渐由艺术扩展开去，涉及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主题。

1958 年，伯格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我们时代的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作品以半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位虚构人物匈牙利画家亚诺·拉文（Janos Lavin）的流亡故事。伯格把小说背景设定在伦敦，其实是想让其更为符合他当时的生活境况。谁知，让政治气温降至冰点的“冷战”却让西方激进的右派们头脑发热过度，认为伯格是在为社会主义国家说话。德国的反共组织，“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给出版方施压，使得此书仅上市一个月便被迫收仓入库。

50 年代，欧洲的右派不仅“右”，而且还“右”得莫名其妙，由此可见一斑。这件事，也让从小就思想左倾、出身底层的伯格情感上更加倾向向马克思主义。在写完两部展示英国腐朽空虚的都市生活的小说之后，伯格在 1962 年“自我流放”离开了不列颠，移居到法国乡间。

真正让伯格名声大噪的，要算是 1972 年他为 BBC 拍摄的艺术系列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这部《观看之道》，其实深烙着时代的印痕。电视片的开始，伯格用裁纸刀从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中切割下维纳斯的头像，用带着几分神经质的声音对镜头说：“观看之道，其实并非出于观看者的自发，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习俗……”

《观看之道》中，洋溢着伯格对于资本主义影像技术的批评。他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现代绘画和摄影技术，已经背离了 14 世纪以来西方绘画的传统。传统油画中那种活生生的历史感，已经被精巧设置的场景与构图所取代。这些画面不是建立在一种对于“所有物”的观看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以个体、以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基础上。大众摄影术的泛滥使得一切场景都像是一种广告，“观看”的背后，显示出其实一种资本主义向普罗大众推销的白日梦。



但与一般被封为“左翼”的欧洲知识分子相比，伯格又有所不同。20 世纪初期，费边主义在英国工党下议院议员以及知识分子中间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随着 30 年代不断涌现的左翼读书俱乐部以及新费边研究社的成立，左翼思潮的影响力更是达到顶峰。然而，尽管有不少标榜社会主义的读书人，英国的知识界却并没有形成欧洲大陆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恪守，让英国人更愿意将社会主义理念体现在政党间的议会辩论上，而不是将之束缚在学校的高墙深院里。所以，在德国、法国版的“文革”上演时，英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的位置却是岌岌可危。

而向来都是独来独往的约翰·伯格，一方面长期“在野”，此外他的思想也并不属于任何一类的学院派。这使得伯格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主义”，确切点说，伯格其实是不屑以“马克思”来给自己贴金的。在尖锐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对写作深度的追求之间，伯格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

这或许就是伯格的迷人之处。在 80 年代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残酷镇压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期间，伯格并没有如众多庸俗的左派人士一样，通过游行、集会、扯横幅、睡马路、与警察干仗等等节目来标榜自己的立场。他通过 Knud Stampe 等人创作的英国矿工的写实派画作，找到了为这一历史事件塑形的办法。



在《约定》中，收录了他当时为英国矿工所作的一篇文章，伯格在文中认为，将艺术与政治割裂的评价体系完全是一种谬误，“艺术审判那审判之人，为无辜之人伸冤，向未来展示过去的苦难，因此它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并宣称“有权势者害怕艺术，……因为它最终与正义密不可分。”因此，这些描绘英国矿工状况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保存了这些“时代英雄”的最佳载体

伯格评价艺术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认为政治与艺术始终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代变迁会呈现或明或暗的变化，却

不会消失。他深为 19 世纪末法国乡村的艺术家费迪南·谢瓦尔花了 9 万多个小时自制的“理想宫”所倾倒，因为在他心里，相对于资本主义过目即忘的宣传，农民阶级身上保存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时间经验。因此，邮差谢瓦尔关于“能否保持农民的阶级身份同时进行艺术创作”的诘问，被伯格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传统主义者们的普遍疑问：机械复制的文学和艺术能否取代人们对于传统以及未知世界的敬畏？

在伯格看来，资本主义所兜售的文化形式是外向的、消费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而传统主义的文化形式是内敛的、缓慢的、从历史的根系中获得给养的。在《讲故事的人》中，他特别从食物的角度论及了二者的区别。“在布尔乔亚的生活里，膳食具有规律、象征的重要性。烹饪书畅销，大多数报纸都有美食专栏。”而农民的宴飧，始终被劳动所包围。“食物代表着劳动的结束，随之是休息”。对于布尔乔亚，进食恰恰标志着夜间社会生活的开始。

不过，伯格极为反对将所谓的底层、无产阶级的社会行为和艺术形式装点成一种阶级斗争史的做法。在阅读尼克吉斯·哈基尼科拉乌的《艺术史和阶级意识》时，伯格彻底被作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给搞得烦躁不安，因此，他大骂这类艺术史家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更系统方法，借助它，一个阶级或者另一个阶级的部分投射、伪装、辩护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行为。他引用马克思那个著名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认为，古希腊的雕像是美的？他自我回答说，虽然“艺术家、世界、造型方式”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但“艺术作品永远是历史和心灵的综合”。缺少了这种幽深绵长的东西，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

正因为对于“左翼”理论家的耍嘴皮和学术争吵毫无兴趣，伯格选择了法国乡间，选择了自我放逐。这些踪迹都可以从他的自传小说《我们在此相遇》觅得一二。他曾经踏着博尔赫斯的足迹来到日内瓦；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回忆二战时那些“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罪行”；而在伦敦的伊斯林顿，他则回忆起德军空袭英国时，和情人躲在寓所内聆听远处隆隆爆炸声的情景……

所有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场景被伯格的回忆穿插在一起，显得那么凌乱、无序。但是凌乱与无序，不也是人在历史中扮演的最真实角色吗？约翰·伯格并未打算为自己立传，他所希望的，无非是通过一位匿名的旅行者，为人们的记忆保存一些个人的、细节的，并非来自于任何宏大主义或理论的叙述。正如他所说，“无论政治信仰抑或是个人动机促使我写点什么，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便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伯格的“奋斗”，显然是一种“抵抗”的奋斗。

抵抗什么？有人会问。抵抗一种对于历史、艺术、以及我们自身现状的理所当然的阐释，一种按照阶级归类法对于这一切的阐释。我们并无必要再多认识一个所谓的左翼知识分子，但我们却应该了解一个真实的约翰·伯格，而这，需要的是对他真正的倾听。我们常常把“Berger”想当然地翻译为伯格，而并没有真正倾听其本来的发音，译为约翰·伯杰（台湾译法，此处为正解），正如我们对他的作品时有的误读，伯格的本意，并非依靠贴标签就可以读懂。

行文至此，又不得不推翻开篇转述梁文道先生的观点。约翰·伯格实际上并非什么左翼思想的“传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之一。只是，他讲述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故事是那么动听、那么深邃，以至画室中人听后认为是艺术、引车卖浆者听后只当是闲谈，而那些怀有济世心肠的读书人听见，一不小心就把它当成了掷地有声的左派宣言。

（图片依次为约翰·伯格、他于 1972 年为 BBC 制作的“观看之道”节目和他论述过的摄影作品【作者为 Anabell Guerrero】）

《讲故事的人》（英）约翰·伯格 译者：翁海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

《我们在此相遇》（英）约翰·伯格 译者：吴莉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约定》（英）约翰·伯格 译者：黄华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

Travel 行迹

夹边沟

罗四鸽 (上海, luosiling_china@163.com)

1

到酒泉的唯一目的是去夹边沟。

夹边沟, 50多年前, 甘肃酒泉县紧挨着戈壁滩的一个劳改农场, 占地约一万亩。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 它显得太小太小, 小得几乎很难用一个点标出它确切的地理位置; 然而在当代中国历史上, 它又显得太重太重, 重得许多人掉头掩面, 不敢去触碰与这个地名相关的那一段段惨痛的记忆。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 几乎每天都有一个生命消失在这片戈壁荒滩上, 死亡最高峰时, 每天有数十人死去。这些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 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 他们中有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水利专家; 有自愿放弃优厚生活条件, 来到边疆支持建设的医生和教授; 有正直善良的工程师; 有出身书香门第的热血青年……可在夹边沟, 他们是右派, 必须在这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劳改劳教农场终日劳作。罕见的大饥荒来临, 为了活命, 他们吃光了荒漠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然而, 大多依然活活饿死在这片戈壁滩上。

40年过去后, 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 当年的悲剧被封存, 生还者大都谢世, 少数幸存者大多三缄其口。

2000年7月, 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 此后, 每月1篇, 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 第一次讲述了夹边沟里发生的故事, 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 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 他哭倒在地, 把报刊供在桌上, 长跪着, 一页一页地读, 一次又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 父亲去世时他还小, 只知道父亲死

在夹边沟, 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的临洮县, 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 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 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 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此后, 2001年, 西北民族学院退休教师和凤鸣, 这位当年与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 亲眼目睹当年惨状, 经历丈夫活活饿死夹边沟的当年甘肃日报社的记者, 用10年的时间, 将自己40年前的经历一一记下, 血泣成书《经历: 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年3月); 2004年, 甘肃作家邢同义历时数载写成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用丰富的材料与纪实的手法, 再次揭开夹边沟沉重的一幕。

如今, 对于读书界, 夹边沟可谓大名鼎鼎, 但实际上, 当地人知道的很少, 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更少了。坐在从兰州到嘉峪关的列车上, 我向当地人打听如何去夹边沟时, 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地方。一位老板模样的人问我, 去酒泉为何不去卫星发射中心看看呢? 我只好独自看着邢同义的《恍若隔世》中的一副夹边沟的地图, 琢磨着如何才能到这个地方。因为到西部之前, 我便向《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年)《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的作者杨显惠打听过去夹边沟, 杨显惠告诉我, 没有人带领, 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是很难找到夹边沟的。

不一会儿, 列车服务员出来兜售开过光的领袖金牌神像, 讲述其神奇的力量, 并竭力向每一位乘客推荐: 属啥买啥, 十块钱给自己和亲人带一个, 保佑平安一生健康。窗外, 苍硬嶙峋的祁连山延绵不断, 塞外初冬的肃杀之气已让大地成为一片灰黄。

2

大约半个月后, 从祁连山牧民家下来, 回到张掖, 我坐上了去酒泉的大巴。在候车时, 我与在兰州的邢同义老师打电话联系, 他让我到酒泉找他曾经的助手王山泉老师。四五个小时后, 我与王老师在酒泉汽车站南站见面。但由于大雪, 王

老师对自己的车技不够自信，特意找来专门的司机。下午三点半左右，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终于走向夹边沟。

夹边沟位于酒泉三墩乡，在车站等王老师时，我看见有去三墩乡的班车，但仅能到乡上，不能到达夹边沟林场。如今的夹边沟林场也就是当年的国营夹边沟劳改农场，离酒泉城仅 30 公里。由于雪大路滑，车行比较慢，将近四十分钟，我们才到达。在路过夹边沟林场场部时，王老师指着其中的一排砖土结构的旧房子说，那便是当年的旧工房，右派们住的地方。据说，劳教人员撤走以后，这些房子曾一度被改为仓库，有的改成了牛羊圈。

从场部左拐，车子驶入一条小道，四周是起伏不平的雪原，再也看不见行人车马与建筑。据邢同义书中介绍，近万亩的夹边沟是一个易守难逃的地方，它的周围是茫茫戈壁，戈壁连着荒丘，荒丘连着水库，水库连着河滩，只有它的东面有一个小小的夹边沟村，农场便是因为这个村而取名夹边沟农场。酷暑，这里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严冬，则又冷到零下二十多度。到了晚上，如果不懂得星相，根本就不知道方向，随意乱走，只能走向死亡。此时，我们便是驶在进入夹边沟的唯一的入口处。由于大雪，看不到原农场右派开挖的排碱沟，也看不到戈壁滩的本来面貌，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车行四五分钟后，前面的道路由于冰封不能通行。王老师让我下车，指着右边一片用铁丝网围起的雪地说，那些起伏的小包便是当年埋尸首的小山丘，现在雪大，看不到什么。若是没有雪，那些小山包下，依然可以看见一道道人形的凹坑。有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包裹尸体的衣服和棉絮，以及一些遗物。有的衣服翻开，还可以看见里面的颜色。

我有些惊讶，万万没想到这些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的雪地，便是邢同义书中提到的“白骨累累无人收”“新鬼厌烦旧鬼苦”的小山包。据邢同义多方调查，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近三千劳教人员，到达的时间大约都在 1958 年 5 月到 10 月间。到 1961 年 1 月，“抢救人命”行动开始时，夹边沟里只剩下不足半数奄奄一息的幸存者。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中，写到饿死人时采用了一个医生的回忆：“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历。”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夹边沟农场，为了给家属有一个交代，对外有一个说法，每一个死的人都有一个像样的“病名”，一个古老的疾病名“急寒病”被频繁使用。针对这种“急寒病”，当时的农场还出现两种“药”：模糊汤和康复丸。所谓的模糊汤就是面打成的糊糊，康复丸的主要成分是豆面和红糖。可惜，当时这样的“药”也不多，得“急寒病”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起初，死人还是个别现象，就由劳教人员自己抬出去埋了；到后来，劳教人员们自己都没力气，只好雇周围的农民抬出去。而埋葬的地点就在旧工房后不远的小山包处。

在寒风中，我和王老师走进了这片被铁丝网围起的雪地。这片雪地是邢同义写信呼吁后，才用铁丝网围起保护起来的，以供家属吊唁。即便大雪没及鞋面，凸起的山包下，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道道人形的凹痕。对于右派坟墓，夹边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瓜趟子”。因为当时埋人非常简单，就是挖一个小沟沟，半米深，和种瓜时挖的沟即“瓜趟子”差不多，一个接一个，也没有棺木，死时穿啥衣服就是啥衣服，好一点的用芨芨草编的席子衬在身子下边，便算棺材。因此，在时隔几十年后，还能轻易看见这些“瓜趟子”中的棉絮被褥、棉布袜子、铜质拉链、驼毛裤子、花布衬衫、钢丝表链。火柴盒和纸烟渣等等。凭着记忆，王老师用树枝挑开几处地方的雪，已经失去颜色的衣服显露出来。

几处，有新的空酒瓶插在雪中。王老师说是家属祭奠留下的。但实际上，这些家属是很难寻找到亲人的遗骸的。1969 年，夹边沟农场被部队征用，对坟场进行了整理，一部分留在原处，一部分迁到了别的地方。原先为死者所立的木片、砖头、石头等“墓碑”已不见踪影，这些所谓的坟墓早已是无主坟。然而，一直到今天，一直有人来寻找、祭拜亲人。2002 年 8 月，《夹边沟记事》中《逃亡》的主人公高吉义（逃离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幸存者）便带领五名在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分子子女，从兰州到这里祭奠他们的难友与亲人。

茫茫戈壁，沉寂无言。

3

一个星期后，我在兰州见到了邢同义老师。寸板短发，虽已花白，却让已年过六旬的他颇有几分精神。

对于邢同义来说，夹边沟是一个幽灵，总是徘徊在他的身边。1961 年初，邻居郭妈妈三天三夜撕心裂肺的哭泣，永远萦绕在还在上小学的邢同义的脑海中，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夺去郭伯伯生命的夹边沟。此后，夹边沟里的悲剧就像梦魇一样，不断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挥之不去。无论是在中学读书期间，还是在煤矿当采煤工、在省城从事新闻工作期间，他总是不断听到有关夹边沟的故事。

1996年春，邢同义调到酒泉，进入了夹边沟，从此，他开始了近八年的寻觅。从夹边沟农场到新添墩作业站，到高台明水农场，到安西，到兰州，到天水，到窑街，到一个个有线索的地方……

随着对死者和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那一个个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那里还埋葬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思念、亲情、正义……人类社会追求的许多美好的东西。

于是，他想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

与杨显惠用小说来讲述夹边沟的故事不同的是，邢同义选择了完全纪实的手法。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同时，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当年的报刊、档案和有关书籍，掌握了大量当时的背景资料，仅收集的资料，就有两尺来高。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最后，他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这也是他找到的目前唯一在世的劳教农场管理干部。此时的罗增福已经半身不遂卧床多年，思维虽然清楚，但语言表达非常吃力。邢同义来到他的病榻前，与他长谈了两个多钟头。根据他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经过反复思考比较，确定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 2800 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 2500 名左右，“坏分子” 300 名左右。

在采访和调查中，邢同义还注意到一个比“劳教分子”更不幸的群体——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和判刑的右派，这是以前诸多关于右派分子作品中很少关注的对象。

从 1958 年 10 月 16 日到 1962 年 1 月 6 日，夹边沟农场共将 46 名“劳教分子”告上法庭。为了解这个更为不幸的群体，邢同义对这 46 人涉及的 40 个案件一一进行了调查，并努力寻找这些当事人或他们的亲属。

2002 年 8 月，在甘肃安西县，邢同义见到了马述麒的遗孀李春兰，这或许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他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了马述麒在夹边沟所经历的一切，老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表示感谢，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经历。

作为政府官员，为什么会执着于这段历史呢？这是几年来，我一直想问邢同义的问题。对此，邢同义沉默一会，笑道：“良知吧，也是实事求是吧。”如今，在工作之余，他依然继续着甘肃这段历史的研究。在新近发表的《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炎黄春秋》2009 年第 2 期）上，他用事实说道：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结果。

在《恍若隔世》第一章，对于建立于 1954 年 9 月的《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国营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邢同义客观分析道：“从《任务书》所介绍的考察情况和立项本意看，当时的各项工作和对困难前景的预测，都是比较客观的，应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事实上，直到大批劳教右派进场之前，建场和开荒工作都还做得有条不紊。……1958 年，大批右派开始进入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在‘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一路下滑，农场已经没有办法取得劳教人员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据说，到 1959 年，全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一个季度左右，这在劳改、劳教系统的其他农场都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省劳改当局非常恼火，又毫无救人措施，只是眼睁睁看着这些劳教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饿死。”

2004 年 1 月，《当代》刊登了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

（图片为作者摄于夹边沟。上图为右派葬身之所仍可见的棉絮，下图为白雪所覆盖的隐约人形及祭奠死者的酒瓶）



TRANSLATION 译介

洋人新左派（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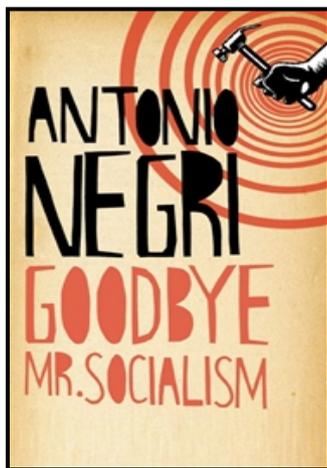
译者：孙传钊（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译者按语：

几年前，《帝国》中文版问世、安东尼奥·奈格里和哈特访华，这两个欧美洋人新左派在中国热了一阵，热得快，冷得也快，最近似乎不太听到国人谈起他师徒俩，正好手边一本奈格里的 *Goodbye Mr. Socialism*，那是 2006 年接受塞尔斯（Raf Valvola Scelsi）采访的记录，与《帝国》相比通俗得多，活泼得多。抽空在书中找点自己关心的话题翻译，介绍给关心奈格里的中国读者。

一 安东尼奥·奈格里论汉娜·阿伦特

Scelsi: 回到刚才的话题吧！关于极权主义范畴，1950 年代汉娜·阿伦特为了把苏联也“恰当”地归入这个范畴，花了一番心思。其实，阿伦特当时出来冷战的高潮时期，当时她的理论构筑与意识形态的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Negri: 确实，阿伦特那种思路在 1950 年代流传开来了。那时期，我在派德瓦大学从助教做起，后来当了教授，那时候参加“公正和自由”社团的组织活动。

首先，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正如你所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这并不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因为它那所谓独裁体制等能包罗万象地支配整个社会的含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是因为它不具有真实的实效性，而是，因为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会取消抵抗和（人们对其态度的）差异。即完全失去了伦理上的认识要素和认知上的政治要素。产生这种效果的范畴，是不可取的，不采用为好。不考虑差异描述事件的范畴，可以说其本身也是全体主义（极权主义）的。

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重要。因为她认为美国革命是在政治层面上组织社会各种力量的，通过实践构建民主政治空间。与美国相反，法国革命是幻想构建一个其自身不能构成体系的社会关系，所以不能抑制各种各样颠覆体制过程的反复。这观点完全是不能成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阿伦特所谓美国建国之父们对“组织讨论政治的场所”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是事实。她认为法国人、俄国人也不是完全被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捆绑住了（只是他们的立宪设想没有具体地细细考虑）所以不明确地考虑政治了——阿伦特这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即使没有比美国革命更多地考虑自由，至少也与美国革命一样追求自由，也是拼命地反抗压迫的革命。

阿伦特命题的立足点是：创造出政治空间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法国革命是不足取的革命。而且后一种革命构建的空间的设想，实际上只是那些夺取物质利益和他人财富社会艺人表演出来的利己思想。她的这些观点都是自相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阿伦特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不是对当时的实际社会压力没有一点反抗力吗？

虽然这么说，但是她对卢森堡、对 1956 年匈牙利革命的评论，有很深刻意义，是极其聪明的评论。可是她写的抵抗极权主义那些著作，明显远远没有到达这样的水平。她的关于行为与伦理、关于康德的（伦理）范畴的著述，都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从整体来说她的这些著作受到当时的冷战气氛很大的影响。我在法国任教的时候一直这么说：说阿伦特坏话是一种亵渎，可是，□□□□□□

因此在我看来，把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都归于极权主义范畴，放进我们历史的现实知识中，与什么混在一起，太杂乱了吧！我想更深入思考的是贫苦人与富裕人的斗争、或者说无产者与资本家的斗争，需要一个比极权主义的概念更确切、更能把握特征的概念。就像马基维利提出的那种概念。

二 论中国（第 12 章 21 世纪中国的走向）

Scelsi: 毛泽东对现代问题作出前现代的回答。

Negri: 中国的事情总是很奇妙的地方，一到这个国家，光怪陆离，看得我眼花缭乱。假如我是帝国主义者就要动脑筋分割这个国家。帝国主义分子为何会让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来，我不能理解。统一的结构给了这个国家超出其自身具有的力量。

毛泽东死后，审判四人帮时，开始讨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对待现代化。这种讨论从 1976 年一直持续到 1989 年。之后批判文革已经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毛泽东设想的、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现代化是否可能？”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上述这段时期一直议论这个问题。

1989 年中共作出决议：“另一种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正是这政治决策使得中共加入 IT、智能劳动的现代潮流，吃了大亏。

Scelsi: 他们以前认为从事 IT、智能劳动的并不是精英，也不能养活 10 亿国民。

Negri: 大概是如你所说那样。但是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社会冲突，□□□□□□，即已经选择了走美国那样现成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共与学生、已经最支持学生的北京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了冲突。

□□□□□□

Scelsi: □□□□□□镇压又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把经济增长放在社会问题的第一位——中共还是依照已经决定的决议自行其事。J.P.Fitoussi 等宏观经济学家几乎都盲目相信社会民主化只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步进步，可是，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明显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民主主义不一定是同步前进的。独裁体制的第三世界社会也证明，两者不仅不是同步的，与自由社会或民主社会相比，有时这种体制能够取得更出色的经济成就。

Negri: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我们就认为如果仅仅某种危机发生、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水平时提出民主主义问题是愚蠢的，然而，今天民主主义很明显存在问题，因为智能劳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在大城市中蔓延的智能，如何控制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各样政治的层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欧美各国反中国的浪潮不管如何强大，其本身包含的矛盾。即欧美各国一边赞赏中国经济增长实绩，一边谴责中共，诉说他们体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批评他们的官僚主义。与这相对应的是，欧美人们一方面关注中国城市市民的反抗，一方面对中国不断发生的无产阶级、学生的反抗保持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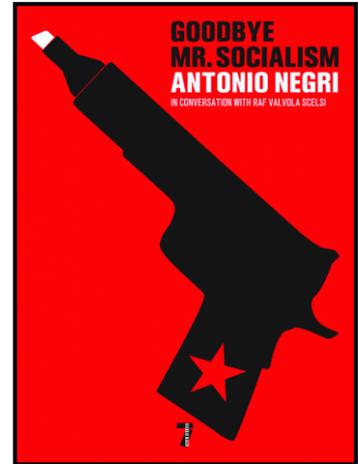
在各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状是革命的状态。万一政治精英引入不同相关的要素，这种革命的势头必然被抑制，朝别的方向发展。从今天中国的这种势头可以窥视到 1968 年意大利的那种形势。那时强大的势头也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代化进步与自由的扩大两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多元的要求与共同的追求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2008 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以这个为契机，中共将会在内部讨论作出新的决议，我们不能把中共看作傻瓜。他们具有把中央的意图非常透明的形式在全国广泛宣传的能力。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共形象是树根与风筝两种东西的混合物。其吸收财富时像树根，发散能量时候像风筝。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中共都有存在下去能力，它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政党是成功的。在某个时候，党和国家会发生重大的变革。即使发生这样变革，人们也不会忘记党的那一段激进的历史。

我在中国参加过几次讨论。一涉及中共党内自由问题，就有人说：“无论谁做怎样的批评，总会有人出来保护他。”这说明了这个国家不是儒家传统的专制国家，人们也不是生活黑社会中那样奉行机会主义的胆小鬼。我们必须以客观的眼光认识到这倒是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反映了包括家族关系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我在中国的同志对待事物的态度是“我在任何时候都代表与我类同的人说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到极高水平，另一方面赤贫的人在挣扎地生存。3 亿人享受到发展的好处，10 亿人被排斥在外。因为这个原因，我注意到中国也许将成为一个激进的国度，共产主义运动再度兴起，但是现在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Scelsi: 现状再前进一步就是革命，也有人认为已经在革命了。在关键时刻，中共选择了强行推行与资本主义水准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它还能从这个体出发转换成其他体制吗？

Negri: 问题并非如此。也许中共已经把满足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为问题提出来了。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很简单地让预言家们感到安心。但是新的（民间）呼声会接踵而来，所以在使得国内的紧张缓解之后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尽管存在各种各样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共与政府机构、社会相比，几乎没有沾上腐败。因为党组织以行政机构、社会有明确的界线。可是我说的以上这些话，没有可靠的证据，只是根据我在中国的见闻、经验说这些话。

确实，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初期——近代开始的阶段，而且可以说，今后不会出现那样的阶段的概率很高。中国会成为一个与资本主义发生冲突的暴力的实体。

Scelsi: 但是根据报道，好像劳动力都在非常苛刻的工厂管理下劳动。

Negri: 我想到 2008 年这个阶段难道还会不会结束？而且又一次的社会重新建构开始了，土地所有制将有革命的转换，他们不是已经事先倾听、估量了农民的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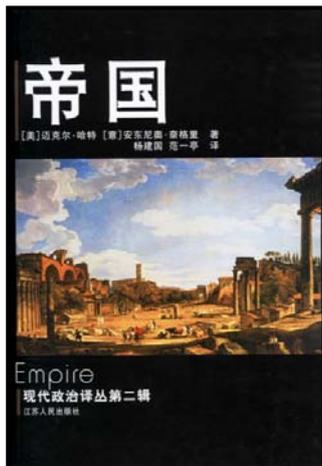
Scelsi: 但是，体制一侧不是已经征收了他们土地？

Negri: 实际上，目前还在征收。他们吞下了民营化的诱饵。我们期待还有抵抗出现，他们吞下的东西只能引起肚子疼的，……。到时候不得不进行财富再分配。

Scelsi: 那不是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解释“国家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了。

Negri: 不断消除各种各样紧张要素，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特点。但其中还缺少借助推波助澜的民族主义来力量。中国以前曾常借助这推动力，而在目前却看不到这举动。如果今后再要发动共产主义，还是会遇到这个问题——缺少建立在民族主义水准上的制霸未来的动力。

所谓“遇到”，就是重新将革命计划与世界共同体主义结合起来的行动，虽然这条道路走起来很困难，却是一条前进的道路。我们唯一能起点作用的，为这样文化、政治上综合的时机到来发出更广泛的呼声。



Scelsi: 问题是如何将那些少数人民，又是持各种各样不同观点的人们统一起来？

Negri: 是啊。但是，书写出来的文字，他们谁都能读解。

Scelsi: 你的著作《帝国》也被翻译成中文了？

Negri: 是的，北京出版了简体字中文版。

Scelsi: 请谈谈中文版首发式！

Negri: 我接受了名誉博士称号，通常我拒绝这种东西。但是那时真诚地完全接受了。首发式快要开始时，记者几乎挤满了那房间，我还没注意之际，发现自己被鲜花包围了，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高级人物与我们一起站在讲台上。彼此都说了开场白后，他们先用中文发言。没有口译者。之后他们给了我一个信封。当时哈特也在，哈特跟他们说奈格里以前从来不接受名誉博士称号，这是第一次。

Scelsi: 请你谈谈他们对《帝国》抱有何种兴趣。

Negri: 叫人吃惊的是围绕言语问题的讨论。中文中的“帝国”一词竟然也含有“中国”的词义。刊登在法国 *Multitudes* 上的文章中的“帝国”和“群众 (*multitud*)”两个词，用中文翻译表达很困难，难以想象的困难。虽然原因不一样，在阿拉伯也存在同样的困难。在阿拉伯语中“*multitude*”一词具有民族共体的含义，双重词义混淆在一起就很危险。

有时候我这么想：与《帝国》表达的内容相比，也许这本书中提出的词语、概念引发的问题更是最重要的了。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哲学家发挥的作用。

Scelsi: 《帝国》还引起什么反应？

Negri: 这本书提出的概念，只能采用最接近的词义来翻译。如何来理解？我想即使没有确切对应的翻译，用他们固有的概念来类推，大致上也不会发生误解。

Scelsi: 许多著作都提到中国这个大国的“经济”奇迹。你的观点与这些著作的普遍的见解完全不同。你根据最近中国国内的舆论，认为 2008 年是个界线，将会开创一个新局面。

Negri: 2008 年是个界线，那以后会把已经积蓄起来的财富重新分配。这也许稍微迟了一些，但中共会根据他们根本的计划重新激活这个已经形成的体制，以自己本国的力量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抱有的政治经济的所有问题：如消费增长、内需回复、……等等。完全不会是那种排外的民族主义、绝对主权政治、中国版的新自由主义复活。

说起来,新自由主义自身也已经面临危机了。原因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自身引发经济失调,而是美国的一国独大霸权主义的行使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的失败。这个危机产生出资本主义已经难以管理的状况。在一个循环后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这就是从撒切尔、里根开始的一个循环。现在只大家对这个循环开战的时刻到来了。

20世纪后半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经济发展往往是在我平时所说的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控制的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实际见到的、能够实证的都是与自由主义的方向正好相反的东西,即经济必然被政治化,被政治组织起来,只有这样经济才能获得正统地位。

好几年前,听到有人说“经济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经济交给经济学家。”在管理成了根本问题的今天,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所有的经济来说,上述说法是有真实意义的。如果也许以管理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循在今天已经形成运作了的话,这个循环必然是公共性的东西。我所追求的是那种更具有“共同性”的东西,总之自由主义的冒险者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Goodbye Mr. Socialism by Antonio Negri, Raf Valvola Scelsi, Seven Stories Press, 2008

★ 本译文为原文基础上的节译,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读者,请自行寻找原著

★ 文中□□□□□□为编辑删节

TRANSLATION 译介

伊斯兰的达尔文问题

作者: Drake Bennett

译者: 朱芳艺 (美国·孟菲斯, fangyizhu@gmail.com)

三周以前,在媒体大肆报道下,一队科学家发现了化石骨架“阿尔迪”,一个四英尺高的雌性灵长类生物,她于 440 万年前生活在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她名为“阿尔迪”(Ardi),是拉密达猿人(Ardipithecus ramidus)的缩写,据她的发现者称,她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祖先。她比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化石“露西”还要早 120 万年,“露西”原本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祖先。

在关于这一发现的论文中描述了一个过渡物种,有猿的长臂和短腿、适合树上生活的善抓握的大脚趾,却也有让她得以在树下直立行走的骨盆形状。

这至少是一个西方媒体覆盖下的人,或亲自阅读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的人所得到的信息。然而,如果你通过阿拉伯语版的半岛台(Al Jazeera)网站得知阿尔迪的话,你会得到截然不同的信息:这一发现驳斥了进化论。

“阿尔迪驳斥了达尔文的理论。”半岛台网站在 10 月 3 日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声称道,而这篇文章并未出现在该网站的英文版里。“美国科学家已提供证据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误的,”该文章开头这样说。“这一研究团队昨天宣布,阿尔迪的发现证明人类并未从貌似黑猩猩的祖先进化而来,这反驳了人类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为时甚久的假设。”

美国人只要熟悉关于在我们的学校里讲授进化论的漫长而苦涩的斗争,就很可能对神创论到底是什么有着一系列生动印象:从 Scopes 案^[1]和根据它改编的戏剧《遗传自风》,到近年来在堪萨斯州、佐治亚州、以及位于宾夕法尼亚的联邦法

【1】 Scopes 案,又称猴子案,是 1925 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著名案例。当时,田纳西州通过了一项 Butler 法令,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就在几个月以后,高中教师 John Scopes 因故意违反该法令面临指控,并被当地法庭判为有罪。为 Scopes 辩护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认为 Butler 法令不合宪法,上诉到联邦法庭的时候虽然 Scopes 被改判无罪,却并未达成 Butler 法令违宪的目的。此案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在 30 年后被搬上老汇舞台,1960 年又出了好莱坞电影版。作为猴子案重要后续的是 1968 年的 Epperson 对阿肯色州案。阿肯色州于 1928 年也通过了类似法令,但执行起来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其后的 40 年没有人因为违反它而受罚。小石城教师 Susan Epperson 在阿肯色教育联合会律师的建议下,直接向州政府抗议该法令。州政府维护该法令,因此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裁定该法令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

庭关于学校课本的斗争。神创论的教义，以及它宗教气味比较隐蔽的表亲“智能设计论”，是经过全面发展的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反叙事，充满了基督教忧虑，由基督教信仰的模子铸出。它还有更极端的形式，由于神创论思想是由绝不会错的《创世纪》信仰所指导，一些神创论者在化石证据里看到的是，挪亚一定是在将恐龙赶入他的方舟当中，与神创的其他生物一起。

而另外一个影响力正在上升的神创论运动，在基督教没有什么势力的国家里，却卯足了劲向科学挑战，这就是伊斯兰神创论。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活动家们已经与在学校讲授进化论斗争了，经常还取得重大胜利。神创论会议曾在巴基斯坦举行，温和派伊斯兰神职人员之公开谴责达尔文思想已记录在案。近来对荷兰穆斯林大学生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大部分拒绝进化论。部分为一个神秘土耳其出版机构所推动，伊斯兰神创论书籍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书店里热销。

这一现象引起了科学家和教育者们的忧虑——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或者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正在增长的国家里——他们在其中看见对科学素养的威胁、穆斯林国家建设其日趋衰弱的科研部门所遇到的阻力、以及穆斯林世界为时已久的宗教与世俗之战可能被引爆的另一闪点。不像西方，神创论信仰在穆斯林世界中并非属于宗教极端分子，恰恰相反，而经常为主流知识分子所支持——自由主义者，他们借助自己之力，在宗教指引和现代科学的前景之间寻找中庸之道的时候，看见了神创论广大的在科学上似乎站得住脚的主张。该运动（穆斯林神创论）的批评者恐怕这将使得神创论更可能设法染指政策方针，特别是当进化论在穆斯林思想者中间被描绘成西方知识霸权的工具，它的确也常是如此。

“对进化论的下一场主要战役将在穆斯林世界打响，”罕布什尔学院一位名叫沙尔曼·哈密德的巴基斯坦出生的天文学家去年12月给《科学》杂志写信时这样说道，他已投入到研究伊斯兰神创论的工作中去了。

很难说进化论在世界上的伊斯兰国家里到底享有多少支持，但肯定不很多。在2006年一项美国政治学家开展的一项研究中，34个工业国家的人们被问到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人类从更古老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思想。土耳其，这项调查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其支持率是最低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土耳其人说他们同意。与此相较，在冰岛、丹麦、瑞典和法国的受试者中至少有80%的人选择同意。（美国排在倒数第二位，仅高于土耳其，40%）土耳其被广泛看作是穆斯林国家中文化最为自由的；而在对进化论的态度上，其他民意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近来一项关于宗教态度的研究表明，只有16%的印度尼西亚人，14%的巴基斯坦人，和8%的埃及人相信进化论。

而当互联网使得进化论和反进化论思想的传播都更为便利的时候，关于进化论的论争似乎加倍尖锐了。伊斯兰神创论的确有其独特的个性：伊斯兰神创论者虽然从他们的基督教兄弟那里借用文献，但他们的忧虑却并非总是相同的。比如说，穆斯林神创论者们不必为《创世纪》这样一本书辩护，因此，对于地球的年龄是以几千年计或是以几十亿年计，或者恐龙的问题，他们并不关心。而且，动物也许从一种进化为另外一种对于他们也没那么多可争议的，部分是因为《古兰经》中的一些段落似乎还在支持这种说法。

但是人类是否由进化而来的问题在穆斯林中一样令人焦虑，而正如在美国一样，争议围绕着在学校里应该讲授什么的问题。土耳其，由于与西方世界更长也更深的联系，其争议也最为猛烈。

土耳其神创论者的第一次胜利于1985年来到，那时掌管该国教育部的保守政党将神创论解释插进了标准高中生物教材的进化论的段落中间（不像在美国，土耳其公立学校的教材是由政府设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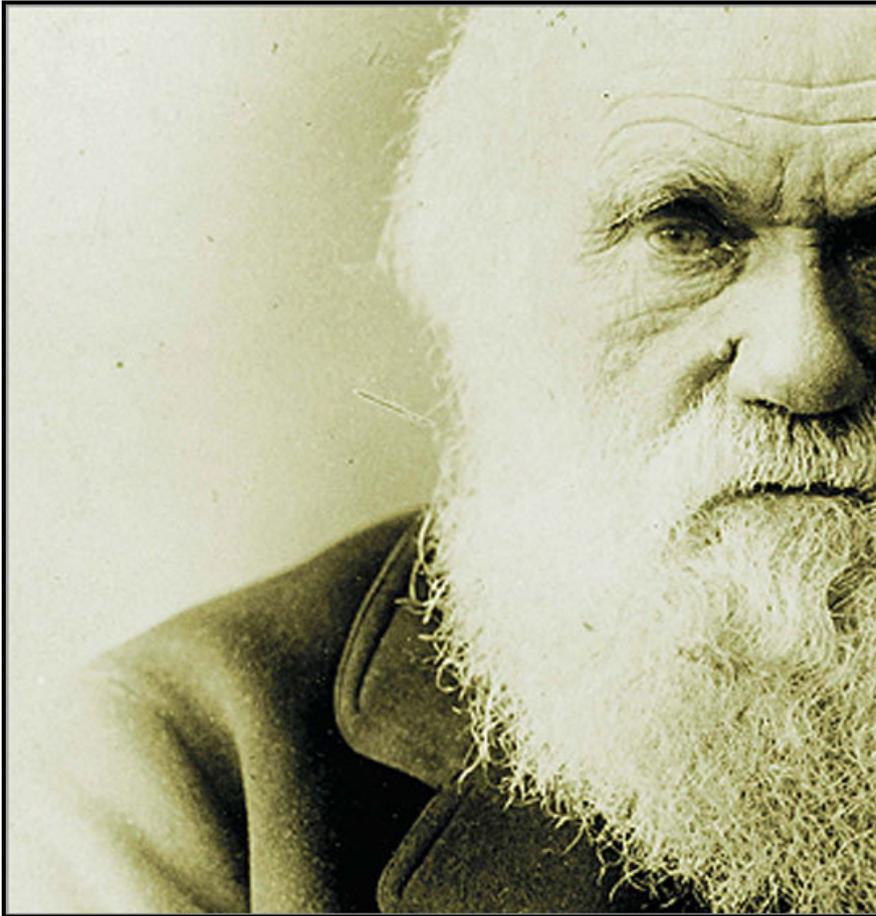
土耳其的科学家和支持进化论的教育者将矛头部分指向美国人，称这一改变是政府官员与美国神创论者之间合作的后果，后者曾于70年代和80年代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考察寻找挪亚方舟的遗迹。然而，美国重要神创论组织和亚拉腊山之行的资助者——创造论研究所的发言人劳伦斯·福特，却在电邮中否认该组织与土耳其政府或伊斯兰神创论者之间有过合作。

“世界各地的人们读到我们的材料，并从中有所收益，包括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们，包括不像我们那样承认基督教圣经无误以及耶稣基督为上帝之子的穆斯林们。”他这样写道。

后来，阿德南·奥克塔的写作和公开宣言激发了在土耳其的争议，此人并未受过科学或宗教的训练（他在大学里学室内设计且没有毕业），却成为穆斯林神创论的最响亮的声音。奥克塔用笔名哈伦·雅赫亚写作，他领导一个保守伊斯兰宗教组

Epperson 胜诉。有趣的是，因为预见到 Epperson 案的结局，田纳西州的 Butler 法令于宣判前几个月很识趣地取消了。（参考《Superstition——belief in the age of science》，作者 Robert L. Park，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织，该组织同时也是一家多媒体出版公司，通过它的网站、音像资料以及大量慷慨发行的书籍，对达尔文思想造成的威胁



发动猛烈的进攻。雅赫亚的长达800页，重达13磅^[2]的作品——《创世地图册》可以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书店里找到，而近年来，该书还不请自来地主动寄给整个欧美的学校和生物学家们。

通过地图册中展示的几百页整页的化石及现代动物图片，雅赫亚的论点是，尽管地球也许有几十亿年那么老，但其上居住的动物和植物却任何时候也不曾变过，今天的它们与最初被神圣地创造出来的时候相同。“当一个人一边看着1亿年前的蜘蛛化石，一边看着另一面的活蜘蛛图，他是看不出哪怕一丁点差别的。他自己就可以作证，而无须变成科学家才能领会。甚至一个小学生都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主义者困惑不解的地方。”奥克塔在回答电邮提问的时候如此写道。

要嘲笑奥克塔的作品是容易的。当被问到为何全世界的生物学

家都支持进化论时，奥克塔责怪“共济会制统治下的科学独裁”。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曾指出过，在该地图册初版的时候，有一幅图片把一个鱼钩错认为一只活苍蝇，这样的初级错误还有很多。而奥克塔在土耳其本土的声誉也正在受损，他目前被定罪为经营犯罪组织，正在上诉过程中。

但是奥克塔的主要忧虑——进化论作为无神论的工具致力于摧毁伊斯兰教——的确在土耳其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引起共鸣。很多奥克塔的追随者是居于城市的富有的土耳其精英青年。穆斯塔法·阿基奥尔是土耳其的一位自由派穆斯林专栏作家以及电视主持人，在90年代曾短暂参与过奥克塔的组织。尽管他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阿基奥尔在2005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的一个关于是否应在科学课上讲授智能设计的听证会上，代表拥护智能设计的“发现学院”发言，来反驳该议程只是为了基督教。

自那以后，阿基奥尔的观点已经有所变化。对于智能设计和是否存在神圣力量的微观管理之类的断定，他现在更加犹疑不决了。“我觉得它仍是有说服力的，”他说，但是他发现另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安拉将进化的初始条件设定好了以后就去休息了，而让一切按照计划展开——阿基奥尔认为这与杰出英国考古学家西蒙·康威·莫里斯，一位坦率的基督徒的想法很类似。

土耳其仍然是伊斯兰世界关于进化论的争论的震中地区，但是这一争论在别处亦有进行。90年代中期在黎巴嫩，政府将进化论从公立学校教材中剪除了。麦基尔大学进化论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埃及和巴基斯坦，尽管高中的官方教材包括了进化论，很多自己都不相信进化论的教师也经常会告诉学生不要去相信。麦基尔大学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印度尼西亚，雅赫亚的《创世地图册》被用作辅助教材。

杰出穆斯林宗教学者中坚定的温和派们辩称说，进化论不能解释人类的发展。乔治·华盛顿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塞叶德·侯赛因·那瑟写道，进化论“生存到今天不是作为一个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教条，一个省事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方案，使得

【2】 13磅约等于6公斤。

人类得以创造一个围绕自己的封闭体系之幻像。”

对于那瑟这样的思想者而言，正如很多西方神创论者一样，进化思想的威胁在于，它坚决主张用赤裸裸的随机机械力、以及围绕资源与配偶的残忍竞争来取代一个神圣的造物主。

“我个人和很多别的信教人士都深受这一黑白分明的二分法的影响，那就是达尔文主义等于无神论。”阿基奥尔这样说道。

对于很多穆斯林而言，进化论在西方的成功这一事实使得它更加充满嫌疑：伊斯兰神创论者会经常把进化论描绘成外来的与侵略性的东西，甚至作为殖民主义的余孽。

“就伊斯兰世界中的进化论而言，非常不幸，达尔文是个白种英国人，因为否则他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可，”麦基尔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伊哈伯·阿伯海夫如是说，他曾公开谈论让他的穆斯林信仰和进化论和谐共处。

在穆斯林世界中，曾有人试图通过谋求古兰经权威的支持来缓解这二者间的矛盾。沙尔曼·哈密德指出，在巴基斯坦高中所用的生物教材虽未提到人类进化，却有一个章节讲述更广义的进化理论。该章节以古兰经里的一句话开篇——“祂从单一生物创造你们”^[3]——这可以解读成支持各物种从单一祖先而来的思想。

类似的神学上的和解却也可以解释神创论为何在伊朗没什么市场。不像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是伊朗的主要宗教，它已建立了一套神职统治集团来解释古兰经，使得什叶派在结构上更类似天主教。伊朗的神职人员，就如梵蒂冈，已经认定进化论不需要违背圣经。

“在伊朗，阿亚图拉们既已认定进化论没有问题，就不需要这些关于神创论的胡说八道了，因此在伊朗的神创论不多，”杜鲁门州立大学的物理学家坦纳·艾迪斯说道。他是关于科学与伊斯兰关系的《和谐的假象》一书的作者。

艾迪斯很快就指出，伊朗神学版的进化论是由一只神圣的手来指导的过程，更像智能设计而不像西方主流版的进化论。但无论如何，如哈密德所说，正是由于对现代生物学及其核心思想之一的相对友好，使伊朗得以致力于积极的、国家支持的干细胞研究项目，这是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而在进化论要比较小心行事的地方，神创论的争议存在本身就可以看作某种进步——对科学上哪怕是丝毫新发现感兴趣的征兆。在穆斯林世界最保守的地方，神创论不是一个政治或哲学的力量，因为根本不需要——根本没什么人去相信进化论、甚至没什么人知晓进化论这回事，因此也不需要一个相反的教义来对抗。

如此，伊斯兰神创论的上升，也许意味着越多的穆斯林世界至少在跟进化论思想搏斗，更广义地说，就是跟科学解释的力量搏斗。尽管这将给西方科学家敲响警钟，但神创论思想毕竟可能给人们提供一个进入科学世界的可接受的切入点。

“它在使一些穆斯林现代化，这些穆斯林想说自己掌握了现代世界并在全球化技术经济中取得成功，而与此同时又要保留传统价值等等，”艾迪斯说，“这些人就是神创论所诉诸的那类对象。”

原载《波士顿环球报》，2009年10月25日

SPEECH 演讲

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时间：2009年11月21日

地点：上海季风书园徐家汇店

主讲人：苏小和

【3】 此处自古兰经(6:98)，中文版“祂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但英文版可作 And He is Who had produced you from a single being，可解为单一生物。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叫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 and 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



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对，是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什么意思呢？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称谓，那短短的10年之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他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跟我们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正是我想陈述的，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与本课题有关的学术框架

让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是有明确的导向原则的，大概是这么几个导向：

-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的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消减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或者以党的组织部的名义来培训富二代；

什么叫以军队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的有进出口贸易，一样的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甚至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中国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做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0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表面看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了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英超美，而这一切行为的主导力

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是可以轻易提出的，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首先是要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事实上，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清楚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集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 and 贸易，任何私人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因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他的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显然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苏联人可以让人造卫星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可是苏联人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企业家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这么几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是成功的，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的，所以无法界定。

那么，按照我对经济驱动的基本理解，我认为最正确的模式，应该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导向的模式。这是我观察、分析百年中国企业史的一个必须要强调，必须要守住的第一理论前提。企业理论纷繁复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一，威廉姆森的企业边际理论，当然是最新成果，而我自己一直沿着三个理论向度在工作。

其一是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在经济学史的层面上，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等人直接指出，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在奥地利学派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框架里面，是没有“企业家”这个名词的，没有人提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古典经济学有价格理论，供求关系，经济分工，迂回生产，边际效应，但却一直不重视企业家定义。从奥地利学派开始，从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哈耶克乃至罗斯巴德，他们第一次在经济学史的框架之内提出了企业家的概念，而且明确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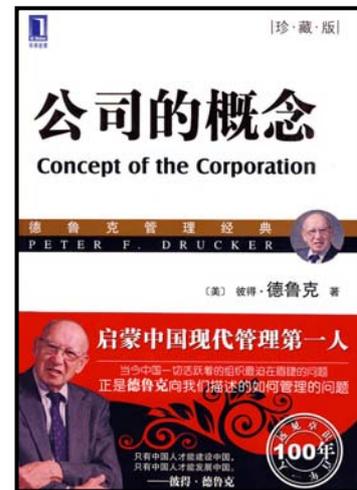
这样的理论意义何其伟大！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必定站立着一大批更加伟大的私人企业，美国如此，日本如此、德国如此、英国如此，乃至韩国也如此。所有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他的经济载体、第一信号、第一表征是企业家或者是企业，而绝不是他们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作的大政府。

其二是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如果说第一个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纬度是我们分析企业的路径这一，那么，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则是另外一个需要我们重视的分析框架。德鲁克在他的《公司的概念》里有一个很优美的描述，他说人类社会首先是家族，然后是民族，然后是国家，一直发展到今天全球化的格局。德鲁克在这里隐含着预期，他认为人类如历史所呈现的，不会止于家族，不会止于民族，也不会止于国家，国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下一步应该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落脚到公司，只有公司这个组织形态，才可能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这个描述其实是很意思的，要知道，德鲁克的这些分析，是在 1960 年代，看看今天，人们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公司的人，也正是由于公司概念的出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利益的对抗再也不想当年那样的需要兵戎相见，而是用一种经济的模式、公司的模式，建立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所以到今天，在上海，在北京，我们看到大量的跨国公司在公司，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量的企业去美国上市，去香港，去伦敦上市。公司把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对抗，或者是国家的边界逐渐消解掉了。

德鲁克这个人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是个记者出身，所以他的书对于真正的学院派来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可是对一个想思考，同时又希望能够看到远方景色的人而言，德鲁克的东西就具有启示意义。大家都说德鲁克是个管理大师，事实上德鲁克他自己最认可的还是他的思想价值，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文明的思考。所以他还提出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事实上是一个人文组织，我想其他的管理学家是不可能提出这个话的，在人们看来，公司首先的意义是盈利机构，是赚钱的机构，公司如果不赚钱，这个公司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就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一直认为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传人之一，他所说的创新，是一种回到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纬度的创新，只有企业家带来的创新才有市场意义。熊彼特对于市场的描述有一个理论的线索，首先他假定整个市场是均衡的，就像今天我们的世界，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刚好是均衡的，不多不少，如果太近，我们就被烧死了，如果太远，我们就被冻死了，如果角度变了，春夏秋冬就变化了。熊彼特认为市场之美，事实上相当于我们的太阳系之美，宇宙之美，它是均衡的。“创新”理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均衡基础之上。企业家出现以后，他们的行为如果是创新行为，就会偶然的、尖锐地为市场的均衡状态提供新的内容，而这个过程刚好是企业家赚钱的过程。

熊彼特有两个东西我们需要说明一下，熊彼特首先假定市场是均衡，就意味着他所研究的“创新”这个关键词事实上



是基于市场的美好，基于完全的自由竞争。我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我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有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它是自我均衡，不需要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某些组织、我们的某些人去强制，去干预，它是自我均衡的。只有在这个理念上，我们再来谈企业才有价值。如果说我们不认为市场是均衡的，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勇气瞎，就会出现国有企业用垄断的方式，打破市场的平衡，破坏整个市场链。

所以谈熊彼特，首先第一个前提我们要认可市场经济是均衡的，就像我们认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均衡的一样。我们有一个无处不在、自有永有、至高无上的神在掌管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否则这个世界没有神，政府就是神，你就是神，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把这句话稍稍延伸一下，假如我们不认为市场是均衡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政府可以大张旗鼓半国有企业，政府可以垄断一切他想垄断的资源，因为政府认为这些行为对市场的自我均衡不构成破坏性，人们也可以做很多很多假冒伪劣的事情，可以在牛奶里面加三聚氰胺，可以把私人财产、企业产权公有化，可以搞公司合营，可以把私人的钱抢过来，可以把老百姓的房子拆迁，而且不给赔偿，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人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发展，为了市场更好的发展，而市场始终掌握在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上。

熊彼特很伟大的，他说市场是均衡的，这个均衡之美是不可以打破的，谁打破市场之美，谁都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亚当斯密的话也异曲同工，他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什么叫看不见的手？手是看得见的。但是亚当斯密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所以我们说，市场在上帝的手上。熊彼特、亚当斯密都是有信仰的人，所以许小年教授老说，我们要敬畏市场，如同敬畏上帝一样。

第四，企业和企业家的三个基本属性。这是我总结的，其实也是一个常识。首先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有清晰的产权，企业是你的，所谓的自然人，一定是个人的，不能是组织的，产权的自然人身份一定要清晰，他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不能是一个团体，也不能是一个组织，那不可以。

其次，一个企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要面对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一定要自由竞争，就是你所涉足的行业没有限制，除了那些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把控，政府来管理，其他的所有的企业行为都是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氛围。

再次，企业家比较有创新精神，必须有核心价值，必须有品牌价值和附加值。当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企业家，在产权，自由竞争和创新这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清晰的定义，这个企业或者是企业家就真正成为了一个经济体的某种主导力量了。某种意义上，这三个维度是我们分析一名企业家最基本的坐标，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当我用这三个指标来分析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你会发现在中国，真正称得上企业的公司，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第五，我要讲讲放宽历史的视界这句话。这句话大家很熟悉，是黄仁宇的一句话。我们看企业家一定要有一种大历史观，大历史是黄老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所以我们看企业家，尤其是百年之内的企业家也要学习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只有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我们看企业，看企业家的命运，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百年中国官商结合模式的区间划分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真正开始谈企业、谈企业家的时期，他是近代企业，有三个形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第二个时期就是黄金十年，1928年到1938年，十年之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比如著名的荣氏家族，张謇。第三区间，则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

其他的一些历史时期，比如像文革时期，像1950年代，像北洋军阀时期，还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没有企业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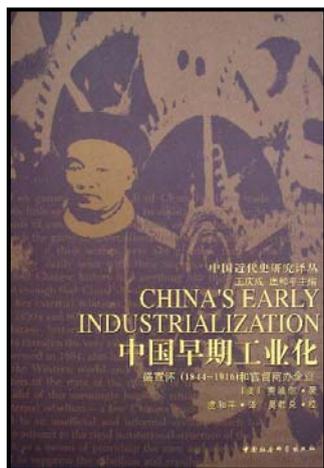
如果说这个区间划分是大区间，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小三代的区间划分，这就是1978年以后的代际划分。第一代是带有原罪的国有企业改制和红帽子企业，比如首钢的周冠武、云南烟草的褚时建，王石，柳传志，以及江苏大量的乡镇企业，他们都属于第一代。第二代就是92派。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和很多体制内的官员觉得在这个体系里再做下去可能看不到希望，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一大批这样的人下海，离开官场，离开学院，不要国家的俸禄，自己去做生意，构成1992年的下海经商潮。十几年之后，这个下海潮中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企业家。像潘石屹，冯仑，陈东升等人。“92派”在企业制度建设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载体，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形成了中国企业前所未有的制度框架，这就是创始人制

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这在第一代企业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三代是新经济企业家与现代企业制度。如果说中国有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仅仅局限在第三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朝阳、丁磊、陈天桥、马云这一代人。他们有海归背景，与外资背景，基于 Internet 工作，加上我们的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并不了解，不知道怎么管制和垄断，所以为第三代人留下了空档，导致他们真正拥有一个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到此为止，我花了一些时间陈述了一个思考的框架，下面就围绕刚才描述的学术模型和代迹划分，进入我们的历史，一起分析跨越百年的官商模式，如何影响了，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

洋务运动

某种意义上，当年的洋务运动，事实上也可以界定为企业运动。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形态，国内的研究非常少，而且不充分，但海外的洋务运动却一直方兴未艾。有几个鼎鼎大名的学者成为翘楚。比如了不起的汉学家费正清，他有一本书叫《剑桥中国晚清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研究洋务运动时代的经济形态，尤其是企业形态。



还有一名汉学家，叫费维恺，也是跟费正清差不多同代的一个汉学家，水平同样惊人，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早期工业化》，专门研究官督商办企业。费维恺的一本书。在我看来，这甚至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案例研究的范本，非常好看，有故事，有模型，有史料，非常有意思。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学者，是就是陈锦江，是一个海外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这本书也挺好，但是国内很少看到。

第四本书是杨小凯的一本书，没印出来，是电子版的，叫《百年中国经济史》，这是上海的朱学勤先生请杨小凯写的一个经济史纲要，其中也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

费正清是怎么讲的？他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面就讲，洋务运动是清末历史上失败的一个企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没有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杨小凯把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他说，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但清朝却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基础和工业化的模式。这种方法上的区别，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清朝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政府在整个经济建设中，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政府利用其裁判的权利，追求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最大限度地压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两位学者的描述很有当下意义。事实上，今天我们的政府也在用他的垄断地位、用他的行政权力来跟我们的私有企业争夺整个市场的资源。今天真正比较值钱的产业都在政府手上，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做啥？你去江苏、去温州、去福建调查，你就知道，只有鞋、服装这种低端的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而且没什么资源依赖的产业在私人企业手上。真正像银行、油石油、电信等重要市场资源，都在政府手上，而且绝对垄断。

所以杨小凯比较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企业建设和市场形态，真是宅心仁厚，入木三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是明治维新跟西方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没有搞虚君共和，他不是君主立宪的框架，但天皇却很少自己操办企业，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皇室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以后，基本上日本政府不办国有企业。所以今天看日本的很多企业，大家都知道丰田、索尼，这些企业都是私人企业，所以日本在百年之内，涌现了一批大企业和大企业家，非常大的企业家，甚至跟美国、德国的大企业可以媲美的大企业家。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日本政府基本上只是可以行使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加上日本模仿了西方的专利法和公司法，所以大量的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使得西方的技术在日本得到广泛的发展。二战以后，战败国日本干脆自己设定了专利制度，鼓励民众发明新技术，通过技术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这就是费正清和杨小凯的基本立场。事实上，陈锦江的分析也很老道。他在《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这本

书里面就讲，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单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一官一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得到官府的庇护。关于官商合办的学术解释，陈锦江给出的分析，是最合乎事实的。他说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事实上没有严格的定义，不是一个可以来定义的学术概念。陈锦江显然非常了解国情，有限类似于今天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表述，类似于与当年李宗吾的厚黑学表述。一切都是一种模糊状态，像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他绝对是朝廷重臣，但是却又掌控着几个大企业，像大名鼎鼎的轮船招商局、开矿局，还有上海机器制造局，都属于李鸿章，他才是企业的老板。而且，李鸿章办企业，并不是今天的官员在暗中操作，而是实实在在管理企业，他在企业里有大股份，他通过行政权力来任命半官方的或者官方的人去做经理。所以看上去更像今天的国有企业，政府有效控股，企业经营人员既是官员，也是商人，官商不分，政企不分。

像这种官不官，企业不企业的现象，洋务运动时代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一个醒目的案例，就是铁路。作为一种新事物，铁路显然是由政府操办。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任何力量也无法动摇。你看今天中国的铁路，你看铁道部，他既是国务院的一个组阁部门，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部，但同时又是整个中国铁路总公司当然的、唯一的法人，唯一的股东，中国铁道部跟中国铁路总公司就是一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的官商模式可谓是其来有自，看上去成了一个正确的，不需要怀疑的客观事实。但用基本的企业理论来分析，却是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的源头，就是洋务运动。

不过，和今天的情形相似，陈锦江的书也记载了洋务运动时代中国出现了几家不错的私有企业，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案例，就是茂新面粉厂，以及后来的纺织业这一块，基本是由私人企业来主导。尤其是面粉产业，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面粉产业，茂新面粉厂都是最大的商家，面粉质量非常好，绝对不像今天的牛根生，好不容易把牛奶做到了全国第一，结果是靠三聚氰胺做起来的。陈锦江认为，为什么茂新面粉厂会成功，就是因为面粉产业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没有被征服垄断，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私人企业。

总体来讲，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是这么讲的，他说与 1949 年后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洋务时期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显得更像一个企业，所以小凯给它命名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年，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以后，1904 年 1 月 21 号，颁布了《商人通令》，然后又颁布了《公司商律》，《商人通令》的第 9 条和《公司商律》的第 130 条，正式形成中国公司史上有萌芽的或者有雏形的《公司法》。1905 年，清朝颁布了《公司登记法》，1906 年颁布了《破产法》、《专利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步《专利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商业大概走上了一个小轨道。所以，从 1904 年到 1908 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私人企业迅速发展的小高潮。那一段时间，全国有 272 家私人企业注册，成为真正的企业。可惜，这种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态势被后来的革命、北洋军阀，被孙中山他们一折腾，终于偃旗息鼓了。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第一个有现代企业制度萌芽的时代，到 1908 年基本上中断了。

一起来看看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家。

我们讲讲李鸿章。李鸿章大家都很熟悉了，我找到了一个秋风写的对李鸿章的分析，我觉得很好的。秋风说，如果从经济史角度看，李鸿章是 150 年来中国第一人。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现在的交通、兵器、电器、矿业、银行等等诸多产业，还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包括 272 家私人公司注册，都是在李鸿章的努力下形成的。

但是李鸿章一方面做了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自己出手办大企业，像招商局这种大企业，像矿务局这种大企业都是他在办。秋风就讲，如果说创现代工业显示了李鸿章的洞察力，那么创造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模式，这显示了他的不学无术。当然这个话有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挑剔古人、挑剔先人的嫌疑，所谓的历史方法论好像差一点，但我先前提到过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的意思是说，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李鸿章的确就是视野有限。在李鸿章改革的时候，在他办企业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企业态势已经非常现代化了，大量的私人企业风起云涌，在美国、在欧洲，甚至在南亚，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人们，已经创办并发展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经济的伟大企业，可是在中国，在李鸿章的事业里，他依然行走在官商不分，政企不分的死路上。历史就是这样丢下了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闭关锁国，政府的胡作非为成为常态。所以我想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把李鸿章定位成一个卖国贼，事实上他才是影响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巨大的传统。李鸿章当年做的很多事情，和我们的当下，我们身边的这个经济体、我们的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不说一模一样，至少是异曲同工。这真让人遗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进步并不多。

再看看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是最有意思的商业案例。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 90 年代，中国人都爱读胡雪岩的故事。好像不看胡雪岩，就没有谈资。大家都说胡雪岩是一个很牛的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但从来都没有人说胡雪岩最后死得很惨。中国人很有意思，只关注他赚钱的时候，关注他跟哪个当官的关系不错，能把左宗棠搞定，把杭州的知府搞定。当时还有一句



话，做官就是曾国藩，为商必须胡雪岩，胡雪岩是他的字。

我想这句话应该算是近代和现代中国的一个政治经济学传统吧，做官的一定要像曾国藩一样，做商人一定要像胡雪岩。可惜胡雪岩死得很惨，我很奇怪，中国人都是要追求大团圆的，都是要注重晚景幸福的，为什么到胡雪岩这里，大家居然不关注了。是不是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胡雪岩有两个大靠山，杭州知府王有林和左宗棠，尤其是左宗棠，左宗棠打仗 60%的经费来自于胡雪岩。所以在胡雪岩身上，企业与官员，所谓的官商勾结到了极致。当时就有人说胡雪岩是个典型的“红顶商人”。

但商业的玄机就在这里，胡雪岩绑上了左宗棠，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一个巨大的、而且是他无力左右的政治漩涡之中。当时的清朝官场，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矛盾，这就是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两人明争暗斗一辈子，最后看上去是李鸿章赢了，左宗棠输了。左宗棠一倒，胡雪岩就倒了，胡雪岩倒得很惨，所有的财产被征服一笔勾销，他远在杭州，被吓死了。去世后 24 天，浙江的巡抚刘秉璋接到朝廷的圣旨，要将胡雪岩抓起来送到北京法办。只可惜皇帝不知道胡雪岩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事只好不了了之。

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家，我们再谈谈盛宣怀。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把盛宣怀的墓翻出来，尸体挖出来，鞭尸，尸骨扔得到处都是。这个结局够惨。但盛宣怀当年却红极一时的时候，那可是万人仰慕。盛宣怀有个七闺女，长得不错，宋子文想跟他提亲，宋家想娶这个七闺女，但盛家的人看不上宋家。都说李鸿章和左宗棠明争暗斗，这是官场上的事情，他们背后的商人，也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的。盛宣怀在生意场上的最大敌人，当然就是胡雪岩。不过，两个人相比，盛宣怀才是真正的红鼎大商人，胡雪岩毕生只是当了一个小官，而盛宣怀则是担任过尚书的人，他的资富可敌国，他家里的财产超过了李鸿章家族，是晚清真正的首富。但是随着清朝倒台，李鸿章倒台，盛宣怀的生意迅速江河日下，晚年他跑到日本躲起来了。在自己的国家，盛宣怀竟然死无葬身之地。

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是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定义，并非我自己随口的说辞。这是民国史最有意义的 10 年。关于民国经济史，杨小凯有一个划分：

1911 年到 1915 年，大概有个四到五年的时间，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宪政阶段，那个时候搞共和，搞选举，搞的挺热闹的，但后来是失败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军阀混战时期，北洋军阀各自为阵，1916 年到 1927 年，这个时候也是没有企业建设、没有经济建设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 1928 年到 1938 年，军阀混战以后，民国的建设终于有了气象，大家就开始做生意，开始办企业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

所以整个民国经济史，真正的经济发展，只有十年时间，就是 1928 年到 1938 年。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著名的黄金十年，民国时期的企业建设，到底是什么样子。

既然是独立阅读的讲座，我还是给大家介绍几本书吧。中国社科院有一个老研究员叫侯宜杰，他写了一本书叫《21 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主要是在讲立宪时候，兼带讲企业。由于把两方面整合在一起，这本书立即在立

宪与经济发展，与中国商人阶级成长关系这样的维度上显示出了重大的学术价值。由于侯先生详尽的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而立宪运动最强大推动力的事实，因此有人就拿美国经济史来比较，认为中国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担当起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种种使命。

事实上，沿着侯宜杰的陈述，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一个事实表述，也成为日后中国企业家建设的一个小传统。当时，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组建学会英国式商会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工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的优势。他们甚至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可兼容”。这些话今天读起来还是弥足珍贵。什么叫做今天中国之政治现象，就是政治制度，什么是与股份公司的性质不兼容，就是强调一定要政企分开。这就是一个普适性的道理：股份公司必须要在完全法治的国家才能发展。所以大企业家张謇在批评清朝当局的时候，就说有经商执政，而无护商之法。

现在看来，黄金十年时代的企业家，简直具有梭罗时代的美国商人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勇气。大家都知道梭罗，他就不交税，你抓我我跟你进去，我坐你的牢，但是我不交税，就是这样，因为你没有代议制，没有代议制，个人就没有任何权利。作为纳税人，首先是一个义务，要为我的政府、为我的国家纳税，但同时也得有纳税以后的权利。你看，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商人的气度。你看看今天的商人，一门心思赚黑心钱，赚了钱以后，把自己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拿绿卡。

再看一本书，费维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费维恺讲，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上自给自足，但是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者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成为国内贸易的主要地区，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完成生产的分工，制造和销售，成为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所以费维恺经过考察，认为 2/3 的商品，是在地方集市上交易的，而这种交易行为直接拉动了中国腹地的农业生产。所以费维恺很坚决地指出，所谓商人剥削农民的观点，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事实依据。尤其是 1949 年以后，剥削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资本家剥削农民，剥削工人，完全是一种阶级之说，与经济的实际演进背道而驰。

我很重视费维恺的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进入 1978 年之后，企业的真正发展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在浙江，在温州，就是浙江经济和苏南经济，尤其是温州，义乌、无锡、乌江那一带。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在费维恺的视野里，这个地方向来就是生意云集，出了很多大老板的地方。不要以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好了，那个地方突然冒出经济，事实上有着很深的商业传统。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费孝通，他的《江村经济》，肯定有很多朋友看过。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你看了这本书，会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元素，在江浙一带生生不息，可以说有上千年的传统。那个地方只要没有政府管制，只要回到熊彼特讲的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很快会有大量的企业、大量的企业家冒出来，这不是政策的恩赐，不是人们突然醒悟，而是传统，是市场的均衡之美。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他 27 岁时写的，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学界的关注？一个很年轻的中国人，竟然可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写出如此伟大的著作，为什么？因为他研究的方向，跟我刚才提到的费正清，费维恺的研究方向，构成了一种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鸣。如果说费正清、费维恺是在历史的框架、经济学的框架研究整个中国经济的态势，找到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动力，那么费孝通就是在社会学的框架、用社会学的方法，找到了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黄金十年时代的几个大企业家。

第一个例子就是张謇，汉语里有博谥之词语，博谥的意思是知无不言，正直，张謇就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有才华的企业家。胡适是这样评价他：“张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的新路，修公路、修铁路，30 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富了一方，影响了全国。”张謇死后，丁文江说：“数年前，我在美国，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悦。今张先生之日，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一无同声赞誉。”什么意思？就是张謇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但他死了以后，大家发现真的是个好人，为国家、为时代做了大贡献，所以所有人都去说他的好话。就像我们说胡耀邦，胡耀邦在活着的时候，也有人骂。但是一旦他去世以后，发现原来是这么一个好人。包括紫阳也是这样子的，他去世以后，看了一些史料，原来是一个这么有良知、这么一个有眼光、有气魄的人，可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再看一看荣氏家族，荣氏家族在整个中国百年企业史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荣毅仁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家。

因为他的前半半是在黄金十年中的发展，后半半是在 1978 年以后的发展。荣氏家族在黄金十年的时候，做生意做得很大，当时有 12 家面粉厂，有 9 家沙厂，典型的股份公司，非常规范的现代公司，荣毅仁的爷爷叫荣西泰，采用合伙制，跟别人开了广深钱庄。荣毅仁的伯父荣从敬，爸爸荣德生，当学徒，继承祖业，最后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产权清晰、资本独立，财产传承合理的荣氏家族集团。就是这么一个企业集团，因为在国民党的后期，遇到过很多麻烦的事情，开庭审判他，荣毅仁去法庭接受审判，搞得心灰意冷。刚好时代大变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来解放上海了，所以荣毅仁很高兴。当时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整个荣氏家族的企业送给了共产党。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但也很无奈的决定。荣毅仁后来扫厕所，他有一个手指被造反的人打断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所以我说荣毅仁是整个中国企业发展史百年之内一个承上启下、跨越两个时代的标本。他们家的历史，事实上是可以好好研究的。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些我议论的话，我跟大家念一念。

“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尝试，我私下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荣毅仁的一生可能基本保全了自己个人幸福和企业价值，大却没有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必要的方法论。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可能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是更多的商人却死在路上，成为中国企业史不忍猝读的深深叹息。

但是 1978 年之后，荣氏家族忽然又火起来了。大家都知道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必须要找一个企业家来形成一个当年企业家的楷模或者形象，一个标杆人物，他想来想去，只有年轻的、英俊的荣毅仁有资本，也有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荣氏家族当年在香港有上市公司，荣家有股份，所以荣毅仁接受邓小平委派的重任之后，当时就派了他的儿子荣智健跑到香港，用祖宗留下来的 270 万港币，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大家都知道的，中信泰富，一个中信，一个泰富，合起来做了很多很多生意，做大了，形成今天中信泰富的框架，荣家从此以后，慢慢慢慢把当年送出去的钱又赚回来了。

前一段时间，中信泰富亏得很厉害，荣智健也下台了，其实还没下台，就在查他的问题。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幽深的故事，荣家的人是知道历史轨迹的，尤其荣智健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荣氏家族是这个样子，他比谁都清楚。所以荣氏家族的家族变迁史事实上是中国百年以来企业发展史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要研究这一段时间的商业历史，就研究荣氏家族的发展史好了。

1950 年代的企业布局

1950 年代为什么要讲呢？刚才我说过，这一段历史，从企业理论的角度看，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想讲一讲。1950 年到 1959 年，可能是人类经济史上最荒谬的年代，我所说的荒谬就是企业发展的荒谬。

首先是公司合营，所有的私人企业全部跟国有企业并到一块儿，大量的私人企业倒闭，消逝。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政府太强大了，很多企业家白天在开会的时候，高喊我要爱党、我要爱国，我要爱社会主义，我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愿意把我的企业捐给国家，非常乐意，包括荣毅仁都这样说。但是晚上回去以后，一家人抱着哭，哭的昏天黑地。

很多有风骨，有传承的私人企业，很多老字号，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彻底扼杀的。比如大家熟悉的三联书店。因为公司合营，今天的三联书店已经没有当年的风骨了，那个时候才出很多好书，很多好书都是三联书店出来的。反过来说，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三联书店还有那么点意思？今天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的人看三联书店出的书，有的时候真的心动，觉得挺好。但是跟当年比，差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传统的，企业就是很有意思，企业的这种传统，像我们身体血液一样的，我爸爸什么性格我总是会有的，我爷爷有什么性格我总是会有的，他总会传承，这就是所谓企业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产权前提，必须要与财产继承的最好理由。

其次是绝对对国有企业化，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一些新企业出现，新企业主要是苏联模式，一共有 157 家苏联援建的国有企业，包括宾馆、工厂都有，包括今天 798 的工厂，那就是苏联人建的，尤其是在东北，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是苏联人建的。那是整个国有企业大铺张的年代。然后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其实就是企业的大跃进，不仅是城市，就是整个农村也在大面积兴办企业，家家户户烧铁炉子，修高炉，把家里的锅、铲，门上的铁环抠下来，把它烧坏了，烧一个铁疙瘩，大练钢铁，那就是当年的企业建设。

所以我要说，整个 1950 年代是企业的毁灭年代。黄金十年之后，经过抗日战争，内战和到 1950 年代，终于形成了一

个历史现象：企业和企业家彻底断代。中国百年之间的企业史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1978 年之后

1978 年以后，中国人终于承认，要做生意，要办企业了。在这里我想引出一个很专业的争论，就是多元化、专业化之争。著名美国的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他有一个理论就讲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发展。常态下，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专业化发展，就是说你一个企业做一件事情，像比尔盖茨他就做 windows，像巴菲特他就炒股票，不做别的。像丰田，专注在汽车领域，你无法想象，像巴菲特那么有钱，太多的钱了，怎么不去做房地产呢？他怎么不去开银行呢？在美国市场，这是可以的，完全放开的，产业没有准入限制。可是他就专心做一件事情。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只有专心做事情，所谓的专业化发展，才能把你的企业做大。当然，美国也有多元化的例子，著名的 GE 通用，他是什么都做。但是他的多元化事实是基于专业化的多元化。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通用他在每一个产业都是老大，你去分析通用的架构，绝对不会一堆的产业，十个产业、二十个产业，每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领域都是最小的或者都是最差的企业，或者都是不死不活的企业。后者才是中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好。为什么有多元化、为什么专业化的发展在中国企业中不被推崇？因为中国的可以盈利的产业空间全被政府拿走了，银行、石油、电力，等等，剩下的可以用自由竞争的方法来做企业的产业并不多。所以中国的私人企业做一个产业不赚钱，就寻找灵以外产业，两个不行，就做第三个，第三十个。大家熟悉的德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中国的私人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要把这个产业跟政府的资源对接起来，要建立稳定的政府关系。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企业喜欢多元化，事实上与我们整个的制度建设有关系。在这个纬度上面，我就提出一个概念，我们要理解中国企业战略，真的是没办法。不是说他们什么都想做，我又讲柳传志了，待会儿还要讲。他做 PC，他做不好，PC 核心技术全是人家的，所以他没办法，只能通过并购的方式，拿了一个 IBM 的 logo，一点点核心技术，现在做的还是这么回事。可是你知道吗？柳传志在做这个的时候，他干脆交给别人去做，他自己的精力做什么？做投资，整合国有企业，他做了很多产业的。事实上今天的联想控股是个多元化的集团，联想早已不再是一个仅仅专注于个人电脑的企业了。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 1978 年以后出现的企业家，事实上是用于实验的一代人，我们还在做实验。用小平的话讲，大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企业发展方式。

这就是我理解的 1978 年以后中国企业发展的框架性描述，然后再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些年来我了解的一些企业的发展战略。

还是先说柳传志。柳传志这个人特点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他的战略选择，他事实上是一种基于 PC 的多元化战略。第二就是他用了 30 年的时间，终于从国有企业的盘子里面拿到了一点股份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关于后者我是支持的，我跟他聊过好几次，我是觉得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像他一样去改制，去想办法，让自己的股权清晰化，让企业的产权清晰化。这其中发生的故事就太多了，真的非常多，好多次柳传志都是化险为夷。当年跟柳传志一起站在台上领奖的几个人，到今天为止就剩他一个人，其他的要么就销声匿迹，要么就进去了。倪润峰，大家都知道长虹，褚时建，一个失败的老人，这样的失败者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企业家都进去了，只有柳传志到今天为止还依然光鲜的站在领奖台上。我认为他是一个奇迹，很聪明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跳出简单的公平和效率之争，仅仅就企业家来讲，他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家。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让联想渐渐从政府管制的陈旧状态中走了出来，渐渐成长为一个看上去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大公司。

说说王石。王石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企业有三个纬度，一个是产权，一个是自由竞争，一个是品牌。后面两者王石是有的，关于自由竞争、关于品牌，万科到今天为止物业是不错的，他是有品牌的，万科到今天为止他拿地的模式他不送礼吗？说实话，他很真送礼送得少，不是不送，跟潘石屹比，送的就是少一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王石的企业万科到今天为止还是国有企业，王石并没有多少钱，他才不到1%的股份，而且是整个管理层的持股不到1%。万科是国有企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今天，万科并不是一家规范的企业，意味着到今天为止，王石并不一个规范的企业家，所以他才去作秀，他才去爬山，他才去航海，去开飞机，搞这个事情。人他是有追求的，你不让我做企业，那我就做别的满足自己。所以我想说的是，作为企业家的王石，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官商结合的陷阱。

第三个田溯宁，网通的老板，亚信的老板。田溯宁这个人有很高的知识背景，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学者，企业家，甚至是官员，只有在田溯宁面前，我认为他真的聪明，你跟他说话，你会发现他条理清晰，娓娓道来，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可是他有一个在我看来很要命的情节，这就是官僚主导意识。他当年在美国认识江公子江绵恒，跟铁道部、跟上海市政府合作，拿点钱，然后做了一个新企业，网通。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他希望他的参与能够在整个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形成一个竞争的框架，然后来开放，然后引导出我们今天比较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认为要做这个事情只有一条路子，就是跟政府合作。当时他刚好认识了江绵恒，江跟他说，你这么有才华，你还是回国做点事情吧。所以他回来办的第一件事情是亚信，亚信是干什么的？今天我们所用的宽带、互联网硬件，通道，全是亚信铺的。不要以为中国移动会铺，没有的事。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不行，亚信毕竟是个私人企业，无法与庞大的政府互动，他判断自己在亚信不可能做大，更不可能改变中国的信息通讯现实。

所以田溯宁做出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决定，从亚信出来，进入国有企业系统，打造网通。他网通做了八年时间，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把网通推到香港上市，推到西班牙上市，包括跟西班牙电信整合，成为一个大的集团，包括建立整个宽带基金。在业内，田溯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宽带之父”，我们以前上网是拨号上网，有宽带也是因为田溯宁这个人。但是八年以后，网通没有了，回到联通去了，网通连名字都没有了。前一段时间，他找到我，说想把他在网通八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现在想说了，以前不方便说。这里面有大量的故事，一个国有企业体制是怎么去牵制一个才华横溢



的年轻人，一个很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官商合作的体制面前，一步步败下阵来。

任志强，很多人不喜欢他，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没那么多人讨厌他。到今天为止，他管理的华远，还是个国有企业，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他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不择手段搞管理层收购，改制，改成私人企业，或者改成一个股份制企业，他不搞，他一直就守着他国有企业的牌子。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第一我爸我妈是老共产党员，我就应该为国家做企业，这纯粹是没常识说的话。事实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想围绕国有企业的权力纽带做事情，还是想沿着官商结合的路径做事情。我认为这才是任志强真正的软肋，网上的一些人骂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他根本不是资本家，他只是一个副处长，他根本没有资格为所谓

的资本家代言。在中国当代企业家里面，任志强可能是把官商勾结这样一个百年传统发展的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人。他平时说话都一套一套的法制、市场经济，经济学、法学，说得很多，但本质上他连元制度都没有解决，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企业家。

接下来我们说说戴国芳。戴国芳在座的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宏观调控之下著名的铁本事件的受害者。需要说明的是，铁本上马，一方面是戴国芳有意为之，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地方政府有意推动。铁本的上马，全是常州市政府一手操纵，政府主动给他土地，银行主动给他贷款，但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来，首先就把戴国芳断掉了，还树立成了全国的一个坏典型。为什么？因为戴国芳没有任何背景，他就是个农民，与此同时，同样是做钢铁的，像刘永好，全国

人大代表，浙江的张志祥，也是个人大代表，也做钢铁，没有垮掉，宏观调控形势一浪高过一浪，但他们全都保下来了，只有戴国芳身陷大牢。所以我要说，某种意义上，戴国芳其实是官商结合模式下的祭品。

这个故事很荒诞，后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戴国芳的荒诞剧”的文章。法国当年以政府的名义，不让企业家来经营、生产印花布，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事情，那么许多年以后，再看今天戴国芳的悲剧，后人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不让一个企业家去生产他想生产的产品？不是导弹，不是核武器。真的很荒谬。

作为一个群体，温州企业家也是要讲讲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温州企业家群呢？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认为今天中国大概有企业家特征的，就是温州的这一群人。但是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群已经出现了变化，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跟地方政府正在努力的建设一种官商关系。我认识一家企业，他就在各地拿地，修所谓的步行街、商业街。你想想拿地，就是几个企业家在桌面上可以谈成的吗？所以他每到一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省长、省委书记来接待他。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看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没有政府关系，没有官商合作，他成不了大气候。他永远只能做鞋，永远只能做衬衣，永远只能做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这种事情，永远是这种浅层的低加工。所以，当年的游牧企业家，这群温州的生意人，今天也已经开始和官员们觥筹交错了。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正在把中国本来就稀少的企业家精神渐渐稀释掉。

身在上海，我当然要提到郭广昌。我个人认为，郭广昌是典型的具有盛宣怀风范的当代企业家，郭广昌现在什么都想做，而且他跟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关系好得惊人。要说今天的企业家这个群体里面，做的比较大，同时又有一点儿洋务运动态势的，就是郭广昌，我是不看好他的，大家都觉得郭广昌是个传奇，但是郭广昌到底是做什么的，谁能告诉我？好像一下子会犹豫一下，你不知道他有什么产品。你说王石，有房子，潘石屹有房子，郭广昌做什么的？不知道。你去看郭广昌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图，你会发现非常复杂。我记得《新财富》做了一期郭广昌的封面文章，用了一拉页的容量，把他整个产业整个描述了一遍，非常复杂，你根本看不明白。我有一次在上海旁听一个会，俞书记也在场，和郭广昌很亲热的，说广昌是我们的小兄弟，我们上海的骄傲。我当时心里就纳闷了，有什么好骄傲的？不过就是所谓的普涨规模，跟国有企业太像了。普天之下的国有企业，都有一个特征：只做规模，不做品牌。你看中粮集团做了很多很多产业，但是找不到一个品牌是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所以中粮把蒙牛收购了，是个很搞笑的事情，绝对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大倒退。

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做个小结吧。

第一我认为官商勾结、官商合作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的阴影。这是我们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细究起来，还是我们的政府太大了，尤其是今天经过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的政府有那么多的外汇筹备，我们的财政收入年年看涨，我们的政府竟然毫不反省，而且越搞越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绝对是一种反相关的逻辑关系。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啊，所有人都企图成为政府的食客，大学生削尖脑袋要当公务员，商人都绞尽脑汁要和政府做生意，给官员送礼，送出去就是英雄，实在不能送给本人，就送给官员的亲戚，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太好玩了。

所以你会发现，你要想在中国生活得好一点，就必须绑上官员，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食物链，就跟一个鲸鱼似的，一个巨大的鲸鱼就是政府，鲸鱼在海里游泳，鲸鱼四周有很多的小鱼跟着它一块儿走的，鲸鱼游得快，小鱼就游得快，为什么？它要吃鲸鱼四周的那些漂浮在水里的微生物，靠它来养活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很多人事实上都是那些游在政府这头大鲸鱼身边的那些小鱼、小虾，没有政府，这些企业，这些人立马死掉。

所以政府太大，市场容量太小，自由竞争水平太低，企业只有规模没有品牌。这就是我反复批评的种种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

企业的形态方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刚才讲的铁道部，中粮、中海油、中铝都是如此，中海油的老板忽然调到海南当书记去了，中铝集团的老板忽然就调到中南海当副秘书长去了。某种意义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的目标不是把企业做好，而是某一天高调进入真正的官场，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个他们看得见的管道，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从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赵紫阳有两篇讲话连续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第一篇就是《论党政分开》，过了几天，又刊登了一片，《论政企分开》，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小啊，看不懂，但是醒目的标题至今还记得。今天我懂得这其中的意思了，可惜斯人不在，作为常识的政企分开制度，至今还没有建立。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有企业只能靠政企不分来发展，只能靠垄断来养活。私人企业只能靠巴结权力。

此情此景，我们的信心究竟在哪里呢？最后我想再次提到田溯宁这个人，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分析，认为人类社会的变

迁、人类社会的进步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技术，是新技术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他说汽车让我们的行走变得更快、更广，因为汽车，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互联网，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走到更远的地方。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肯定地结论，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不可能今天在这里一起谈这个话题。而且我肯定的告诉你，进入互联网之前，我就是个思维单一、观点粗暴、信息片面，头脑简单的中国人。互联网是我的大学，世纪沙龙是我的阶梯教室。是互联网真正改变了我。

最后一句话，在中国，新技术，只有新技术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也才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谢谢大家！

(文中图片为演讲现场)

参考文献：

门格尔 国民经济学原理

米塞斯 人的行为

德鲁克 公司的概念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史》的10卷和11卷

费维恺 《中国早期工业化》《剑桥中华民国史》

陈锦江 《中国晚清时的商人、官府和企业》

杨小凯 《百年中国经济史》

侯宜杰 《21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

费孝通 《江村经济》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迈克尔波特 《竞争战略》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